



中评周刊 | 第 84 期目录

专题 | 再议中美关系

1. 盛洪: 中美关系是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础 P. 2
2. 张维迎: 理解世界与中国经济 P. 6
3. 朱嘉明: 关于思考中美贸易摩擦的若干方法问题 P. 10
4. 盛洪: 谁和谁的“贸易战”? 为什么而战? P. 14
5. 贝克利: 美国领先地位的主要威胁不是中国崛起, 而是地缘政治的过度炒作 P. 19

观点文章

1. 荣剑: 中国外交格局中的“东亚突破” P. 24
2. 冯兴元: 把气候变化整合入长期宏观分析之中 P. 31
3. 郭于华: 克服社会恐惧症 P. 35

随笔散记

1. 雷颐: 梁启超与哈耶克 P. 41
2. 周保松: 自由比容忍重要|怀念高锟校长 P. 45

读书

新闻实验室: 中国有孔洞的审查 P.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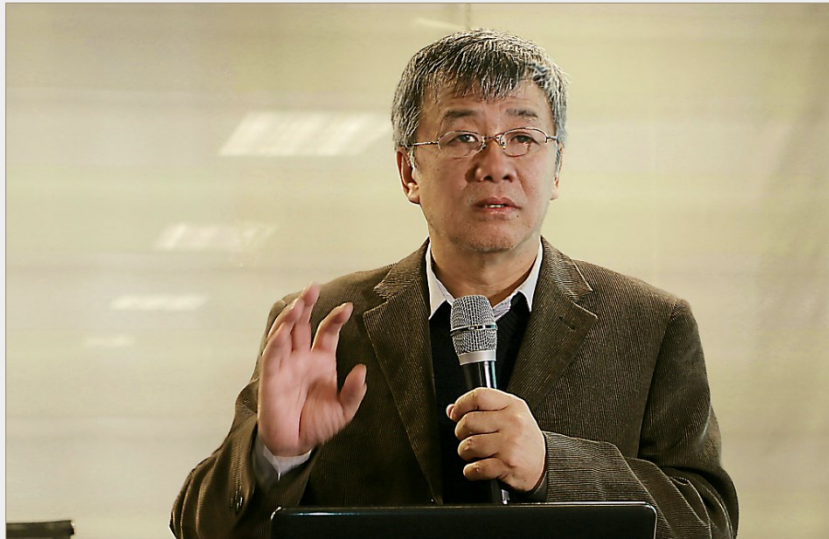
预告

1. 茅于軾教授九十岁寿辰学术庆祝活动众筹 P. 57
2.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P. 59

订阅 | 往期下载 P. 61

盛洪：中美关系是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础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 2018 年 10 月 19 日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



本文作者盛洪教授 图片来源：中评网

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讲话，对中国政府多有批评。中共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很快进行了批驳。双方唇枪舌剑。于是有人说，新的冷战开始了。这显然有点夸大其词。因为冷战最重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仔细看一中美争论，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同意一组政治正确的规则。争论的焦点不是不同规则的争辩，而是对方是否违反了共同认可的规则。

例如，《人民日报》文章的题目就叫作“并不高明的造谣术”，它没有反对彭斯指责所依据的规则，而是斥责他罔顾事实。反过来，这篇文章进行判断所依据的，是与彭斯同样的价值立场。如一个国家要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一国政府不应干涉另一国的内政；一国不应对另一国进行网络攻击；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要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分歧，不要进行军事对抗；甚至在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也要坚持和平统一；等等。既然如此，就不能说是新冷战，两国之间就有着继续进行战略合作的价值基础。

当然，彭斯先生对中国政府的批评相当严厉。但首先不能把批评政府当作攻击国家；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如果批评是对的，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第二，要更深入地理解“国家”的含义，她既不是一两个人，也不是政府，甚至不是当下的全体公民，而是一个人群经过世代的发展与积累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一组原则。在今天这些原则大部分体现在成文宪法中，或蕴含于民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之中。因而，当我们说一个国家时，我们是说这一组原则；爱这个国家，就是爱这一组原则，也就是宪政爱国主义。在国际上，这个国家的这一组原则与另一个国家的另一组原则也许是重叠和兼容

的，这就会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在中国，很早就有天下主义观念，按照顾炎武的看法，如果“国家”还有与具体个人的牵扯的话，“天下”就是一组文明规则。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批评一国政府并不就是攻击这个国家。如果根据这个国家所秉持的宪法原则对这个国家进行批评，更可以说是爱这个国家了。彭斯对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批评，无论是否准确，说到底符合中国宪法原则的。中国《宪法》第34条规定了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第35条规定了表达自由，因而对损害这两项自由的行为和现象提出批评，就是爱中国的表现。即使可能批评涉及的事实有出入，也是一个相对于宪法原则来讲次要一点的问题。更何况，事实相差不大。在今天，中国有世人皆知的网络防火墙，这就损害了中国公民在国际范围自由表达的权利，也成为限制他们在国内自由表达的条件；我们不只一次看到，一些地方的警方或许出于炫耀的目的，将在微信中私下对警察不敬的人抓入牢狱，并在网上公示。

关于“不干涉内政”，双方异口同声。分歧是什么是“干涉内政”。由于有不同角度，讨论起来可能异常复杂。但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对称原则。也就是孔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行为被认为干涉了本国内政，什么行为就干涉了别国内政。对于中国官方报纸在美国报纸上打广告影响美国选举一事，《人民日报》的辩解是“这不违反当地法律”。这显然是比较弱的辩护，因为国际关系不仅只是遵循法律，还要有国际关系准则和道德价值。更简单的判断就是对称原则。中国政府是否允许美国政府在中国如此行为呢？很显然，美国政府根本不可能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的法律不允许这样做。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法律？因为这样做不对。那么，根据对称原则，在中国不对的行为在美国也不对。反过来，如果不承认对称原则，就不可能有公正与和谐的国际关系。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这场中美争论就是冷战，但确实也有走向冷战的危险。而冷战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会更为严重。所谓“损失”，绝不只是指丢掉了美国市场，而是指丢掉了邓小平一手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础。1977年7月，邓小平刚一复出，一手在国内推进改革，一手在国际上落实中美建交。速度之快，令人惊诧。1978年7月开始谈判建交，12月16日发表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就正式建交了。在此之后，邓小平再也没有如此关心过与一国的建交了。这说明邓小平把中美关系看作是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础，只要把与美国的关系搞定了，与其它国的关系也就一并搞定了。不仅是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大国家集团的盟主，而且是导致这种结果的制度结构的发源地。而这种制度结构，也就是以市场制度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保证市场制度不被侵蚀和损害的政治制度。正是这种制度资源是中国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四十年的改革过程中，除了本土制度资源，有大量制度是对美国制度的仿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用开放促改革”。

反过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保证。如果中国还停留在文化革命，对内搞阶级斗争、实行计划经济，对外输出革命，就不可能有如此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

不仅给民众带来了经济自由，还带来了政治结构上的变化，思想解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对言论自由的钳制；市场经济自由让人身摆脱了单位的桎梏；市场在更多的方面起作用减少了政府对社会的直接支配。而要实施市场规则，就要依赖于公正的法治结构。这样一个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和政府民主化方向前进的中国，才能在战略上为美国所接受，也才能形成中美战略合作的格局。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使中国与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消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在价值观上逐渐接近。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从强制性革命转变为和平的改革，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再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从而给人民带来幸福；而是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谈判与交易创造财富。为了进行市场化改革，就要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就要用“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哲学。经过四十多年的演变，市场被抬到了“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高度；“依宪治国”也进入了中共代表大会的决议。

更有中共提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大部分与美国和西方世界认同的价值观重叠，如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和公正等，其它部分，如文明、和谐、诚信和敬业等，也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不相矛盾。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价值观的接近和认同，才是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由于有了价值观上的接近，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才会被认为是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因素，而不是一个声称要推翻资本主义世界，不惜使用暴力的国家，才有可能被人看作是可以紧密合作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与国的争端，而是不诉诸武力，才能为世界提供一个稳定和公正的国际秩序。

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美的战略合作，是互相依赖的两件重要事情。也就是说，不存在没有改革开放的中美战略合作，也不存在没有中美战略合作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这两个重要因素极其偶然地同时发生，并且“太上不知有之”地发挥作用，使得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同时受益。所不同的，是中国受益更大。因为在四十年前，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的人均 GDP 位列倒数第二。因而，较之美国，中国更应珍视这一改革开放与中美合作的互补结构。这个互补结构才是中国人最大的价值和财富。如果认为中国已经富裕了，甚至“全面超过美国”了，就可以低估这一互补结构，甚至不惜在坚持国内垄断利益集团的利益时丢掉中美合作这个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国际环境基础，就会犯最大的历史错误。

那么，美国就是那样不可超越吗？显然不是。美国不是一个完美国家，在历史上也有过很多罪恶。现在美国人的祖先也是用暴力占领了现有的美国版图，美国人殖民了菲律宾，在中国的抗战之初还在发战争财，她错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她也不当地开打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人也很傲慢，彭斯先生的演讲似乎显现了这种态度。他说美国“再造了中国”时，“中国”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宾语，仿佛中国奇迹全要拜美国之赐。然而，美国的这些错误甚至罪恶只能告诉我们，这正是由凡人组成的国家，我们可以加以批评和引以为戒，但不能用来否定美国同时拥有的优点和功绩。与现在的美国相比，中国政府更应受到指摘。因此，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战略合作仍是中

国改革开放、以致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必需的国际环境基础，不能轻易丢掉。

也许有一天，中国能够超过美国，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这一定不是由于放弃了改革开放和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所能取得的，而只能是在改革开放和与美国战略合作的互补结构下实现的。在此基础上，中国若能再能克服现在美国的错误与偏差，才有可以成为有道德感召力和经济实力的文明中心。在今天，中国面临着偏离改革开放轨道的危险，这一危险又会导致失去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将是一个满盘皆输的结果。对于彭斯先生的讲话，虽然我们可以纠正他对历史的不恰当的叙述，但这并不重要。我们还是要把他的讲话看作是一个善意的劝告。他明确地说，他希望中国保持邓小平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这包含了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一定的政治与言论自由度，以及一个向着宪政民主和法治前进的趋势。这对现在的中国政府来说并不难。 ❏

2018年10月15日于五木书斋

[【返回目录】](#)

张维迎：理解世界与中国经济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为作者 2018 年 10 月 14 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MBA/EMBA 学员讲座的整理稿]



张维迎教授

中美贸易冲突的背后不仅仅是中美两个国家之冲突，而是中国同西方世界之冲突，包括欧盟、英国等与中国贸易逆差并不严重的众多国家，也从正面转向负面。这意味着冲突不止是贸易冲突，更可能是背后价值体系之冲突、体制之冲突，而后一问题更为深远、更难以用技术手段调和。为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理解世界和理解中国经济两个角度出发探讨：其一要理解西方思考问题的方式，其二要正确地理解我们自己。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国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

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 17 末世界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二战后种族平等的观念逐渐确立，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尽管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先进帮助后进也是二战后形成的观念之一。此观念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不对等的，中国一开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得援助位列世界银行资金流向的首位，中国加入 WTO 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优惠条款。反观美国为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成本，从其负担约 1/5 强的联合国经费就可窥一斑。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等”要求，也是基于中国之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以中国是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争议。

3、西方所理解的和平

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贸易使得各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民主可以遏制统治者的野心，国际组织则促进各国通过沟通化解误会和冲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带来和平。19 世纪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发明，现在已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 2001 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于 1816-2001 年间两千余场战争数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

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 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下降。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给定年份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军事冲突。换言之，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而贸易和平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时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比民主更重要！

二、理解中国经济

1、理解中国过去 40 年的成就

且不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是否理解，仅仅是中国近 40 年来的历史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以往 40 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无人否认的事实，但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尚有争议。目前，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有“中国模式论”与“普世模式论”两种解释。前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独特的中国模式，即强有力的政府、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和英明的产业政策。后者则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和英国的崛起、法国的崛起、二战后德国、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一样，是基于市场的力量、以创造力和冒险力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中国还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百年间所积累的技术。我年初发表的《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总结了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后 40 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世界 250 年间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后发优势意味着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直接可以共享别人曾经花费巨大代价实验得到的技术成果。

中国模式论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很不好的后果。

2、中国模式论不符合事实

根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国整体市场化指数自 1997 年的 4.01 上升至 2014 年的 8.19，期间在 2009 年“四万亿”刺激政策后市场化指数有些许下跌。但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其中，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场化程度位列前茅，东部的市场化指数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反观地区 GDP 增长率我们却发现，2007 年之前东部的 GDP 增长率一直高于中部和西部，但 2007 年之后反而是西部的增长率位于首位，中部次之，东部最低。还有一系列的证据表明近五到十年来，各省市市场化程度与 GDP 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地区的体制和政策优于东部地区，进而要求东部和中部向西部学习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西部的市场化改革起步晚，因而在后期具有了“后发优势”。东部 1997 年和 2001 年的市场化程度，分别超过西部 2006 年和 2014 年的市场化程度。利用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市场化数据和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经济增长数据，我们发现不管是近十年还是近四十年，市场化指数的“变化”都与 GDP 增长率正相关。这便揭示了“中国模式”

的问题：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我们不能仅凭某一时点上的经济表现而不结合历史就推断出某种因果关系。

更多的实证证据可以用来证实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包括中国城镇国有部门（或者私人部门）就业比重、国有（或外资与私人）工业资产比重等指标与人均 GDP 及增长率的相关关系等等，毫无例外地证明：国有部门越大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越慢；与国进民退的地区相比，国退民进的地区有更高的增长业绩。

中国过去 40 年的增长大部分靠的是技术后发优势提供的套利机会，中国企业家和西方企业都可以靠套利赚钱。随着套利空间的收缩，今后的发展则越来越依赖创新。

经济学家用三个指标衡量创新：研发密度、专利、新产品销售占比，分别对应投入、中间和产出三个阶段。就这三个指标而言，中国近十年来还是取得了不小进步，但地区之间差别巨大。跨地区数据分析表明，这三个创新指标都同市场化和民营化程度显著正相关，却同每万人拥有的政府机构数量和公共部门就业比重负相关。无论用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还是工业资产，平均而言，国有部门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低；私有和外企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高。

3. “中国模式论”后果很严重

上述证据表明，“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中国过去 40 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更大的麻烦是，用“中国模式”解释过去 40 年的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不利。

第一，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一味强调独特的中国模式，对内就会走向强化国有企业、扩大政府权力、依赖产业政策的道路，导致改革进程逆转，改革大业前功尽弃，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

第二，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中国模式论”将中国树立为西方视角下之令人惊惶的异类，必须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对中国过去 40 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在西方人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公平贸易和世界和平不相容，绝不能任其畅通无阻、高歌猛进。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经济学家切勿把“尽管” (in spite of) 当“因为” (because of)。 ❏

[【返回目录】](#)

朱嘉明：关于思考中美贸易摩擦的若干方法问题

[朱嘉明 著名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 2018 秋季莫干山会议“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创新”小组发言的点评，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莫干山研究院]



朱嘉明教授

今天上午，我所在的组的讨论主题是“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创新”。选择这个主题是重要的和及时的。今年春天，我们在北京讨论关于 2018 年秋季莫干山会议主题的时候，中美贸易摩擦刚刚露出端倪，并没有来得及做深入的讨论。几个月后，当我们开这个会的时候，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件大事，会议将这件事纳入会议重要主题，是理所当然。

我所在的组一共有十位发言。其中六位讲者的主题是中美贸易，其他四位中的两位谈财政问题，一位谈中小企业的创新问题，还有一位谈生物制药问题。从时间比例上讲，讨论中美贸易问题占本组讨论 85% 的时间。对于上述十位发言，我仔细听了，并做了笔记。讨论会中的有些题目是比较有价值的：贾涛关于制造业回迁美国的现实性分析，沈建光评估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易中舸把中美贸易、中国中小企业政策做连接，万喆提出中美贸易是一场结构性较量，还有陈林将中美贸易战理解成一种内战，黄建辉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与对策。现在，我在对这个小组关于中美贸易摩擦主题的发言加以归纳的基础上，着重与大家分享关于思考中美贸易战的若干方法问题：

第一，中美贸易摩擦很可能是当代世界经济史的重大事件。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在人类现代经济史上的影响，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讲，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仅是所谓第一和第二经济体的差异和矛盾，而是一个同时涉及经济制度、国家利益、产业政策、企业组织的全方位的差异和矛盾。在美国的两百多年的经济史上，其主动引发的贸易摩擦此起彼伏，是常态。但是，唯有这一次

是全面和深刻的，涉及到一个自 1990 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走向，何去何从？涉及到传统国际分工理论在怎样的程度上还存在意义？有人拿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与冷战相比，过于片面和简单化。在冷战时期，苏美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摩擦的可能，因为那时的苏联不仅仅是一个单一主权经济体，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基本独立于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体系。此外，还有华沙条约组织。简言之，冷战是以美国为首和以前苏联为首的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如今，中国是单一主权经济体，是处于世界第二大位置的经济体。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加入 WTO。回放历史场景，回看中美贸易摩擦的起源，可以追溯的时间节点究竟在哪里？有一种观点是 2008。因为这一年有两件世界性大事，一件是北京奥运会，另一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这种是成立的。但是，如果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做深入考察，对双方比较全面的考察，至少应该追溯到中国参加 WTO，也就是 21 世纪初期，已经埋藏着今天冲突的种子。因为，双方对于如何理解和定义全球化，特别是市场化，原本就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和分歧。只是这种差异和分歧长期被太多问题和重大国际事件所掩盖。事实上，在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美国就有反对力量和意见，在中国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和立场。那时，在中国成立了很多的 WTO 研究所，如今当年活跃的 WTO 研究所存在的很有限，很多问题的研究缺乏延续性，令人遗憾。

第三，中美贸易摩擦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中美固然是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者相加，对全球关系有重大的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对世界的影响不可低估。但是，对于中美贸易摩擦，也不宜过于夸大。道理很简单，全球人口正在逼近 80 亿，全球 GDP 规模不断膨胀，因为更多新兴市场国家的成长，不论中美在世界的人口比重，市场份额比重，甚至占 GDP 比重，都面临着相对减少的趋势。历史确实有过几个大国可以左右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情况，不过那是一个多世纪，至少二战之前的事情。上个世纪，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类，有所谓“三个世界理论”，现在有“市场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划分，归根结底，都是帮助人们避免将世界关系简单化。现在，以全球视野，客观认知中美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大格局中的位置，特别是认知世界经济成长的新结构和极限，这样有助于将中美贸易战置于全球空间之中，也有助于形成理解“一带一路”的新思维。

第四，中美贸易摩擦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的差别。中美贸易战绝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需要有长期准备。为此，可以分为近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所谓近期是指当下的一、二、三年，中期是指今后的三至五年，长期是指五年之后。近期，国际政治因素影响，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个人影响显著，对进出口贸易，科技进步冲击明显，但是，承受能力几乎不存在问题。中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个国家各自经济和政治情况的演变。至于远期，则受制于全球经济大环境，经济和商业周期，世界分工体系，以及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预期等因素。需要强调的是，中美两个国家，都有基于自己国情的改革和转型问题，哪个国家改革和转型更成功，都会对结果会发生正面影响。

第五，中美贸易摩擦和“博弈论”。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博弈论”解读中美贸易摩擦，但是，要避

免简单化。首先，“博弈论”本身有局限性，不足以解释多维的和动态的复杂现象。其次，需要明白谁在博弈？或者说“博弈”的主体。西方国家具有精英阶层相对稳定的传统，意识形态少有分歧，导致学习成本优势。在本组的发言有这样的说法，“美国的主流是不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的”。提出这样观点需要慎重。因为，需要说明根据怎样的统计资料定义所谓的主流。再次，将中美贸易摩擦解释为“零一博弈”，也是简单化。因为，所谓的“共赢”和“共输”也是有内涵的，共赢有一个谁赢多，谁赢少的问题，共输也有一个谁输多，谁输少的问题。此外，还有的发言提出中美“共治”合理性的问题。这个观点很可能是过时的，更可能是幻想。不要说中美是不是能达成共治世界，世界其他国家也不会赞同这样的世界是由中美共治的。总之，在分析中美贸易战或者摩擦时候，避免轻率的使用诸如“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这样的概念。现在，重要的是谁的理性更符合现实和未来趋势。

第六，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制度的选择。这是个要害问题。上个世纪末期的新一轮的全球化兴起的时候，也是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辉煌时刻，所以，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问题。但是，后来的历史并没有走向“终结”。之后的所谓“新兴市场国家”，包括“金砖四国”，没有一个国家遵循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历史走向多元化的过程。全球化本应允许多种经济模式并存和竞争。中国发展是超出预期的。从世界范围内看，将中国发展问题仅仅当作是中国的问题是狭隘的，如果过多强调中国自身的利益，势必将中国发展对于世界和人类的实验意义掩盖了。在现在和未来，纯粹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只有理论意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国家和政府强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已经难以逆转，现在是需要思考如何制衡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方式。简言之，世界经济制度正在走向多样化，其背后的意识和文化形态也必然多元化。

第七，中美贸易摩擦和双方产业结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现在流行一种主流看法：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地位具有相对稳定性，在短期之内难以被替代。这样的判断不够全面，需要加上时间维度。短期而言，确实对中国国内产业链的冲击有限，但是，从中长期看，不可低估了现代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价值链和产业链迅速变更，甚至还在加速的趋势。事实上，在当代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认为它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或者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不可替代。因为，科技高速发展，世界进入以创新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非稳定历史时期，经济史上那种世界分工体系的稳定结构时代悄然远去。还要注意，中国产业链迁出对全球经济，跨国公司利益，以致美国、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家庭的收入和购买力的影响。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特点。贾涛先生在发言中提出“美国回迁制造业的极限”问题，很有意义。但是，探讨和分析美国从全球回迁制造业，需要具体化，究竟哪些产业和行业，要做案例分析。美国的优势产业是高科技行业和观念产业，但是，高科技行业和观念产业不足以解决就业压力。未来世界，基于传统物质生产的“比较优势”理论正在加快过时，世界性竞争将日益向与知识信息、观念、信息和数据相关的产业集中。

第八，中美贸易摩擦和双方科学技术差距。中美贸易战引发人们关注和评估中国和西方的科学差距，主流看法是，彼此差距巨大。但是，不能因此认为消除这种差距，一定需要很长的时间。例如，如果说某科学领域的差距相差 20 年，这不等于说消除这个领域的差距需要 20 年。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历史，当某些科技已经进入到前沿之后，如果能够有效地解决资源组合，体制合理，实现突破并不像人们相像的那样艰难。任何一项科学技术进步都是非匀速的，先发优势只具有相对优势，后发优势不可夸大，也不可低估。特别需要注意，科学技术不同于一般的传统产业，包括人才和资金的科技进步成本不是下降，而是上升，所以，需要注意到愈来愈多的科学技术进步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形成难以跨入的门槛。并且，因为不同科学技术的特点，派生出独特的垄断方式。所以，没有大量的人力和资本的投入，改变科学技术的自然垄断是非常困难。关于科技的垄断方式，现存的政治学尚未充分研究。所以，创新有两种，一种是高尖端创新，一种是群众性创新，两种创新具有截然不同的方法和组合模式。国家对高尖端创新有重要作用，中小企业对民间创新是重要的。

第九，中美贸易摩擦的双方政策体系。为了在比较长期的中美贸易战中支撑下来，需要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整个政策体系包括，贸易战对国民经济的纵向影响，区域影响和横向影响的分析和对策；贸易战对社会的影响和对策，以及对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和对策。所以，制定相关政策，需要跨部门和跨学科的组合，形成对中美贸易的背景、历史、定位、趋势，以及国际反应等方面的清晰认识。目前，中美双方应对的政策体系是有差别的。美国本来是“滞后”的，现在显现“后来居上”的势头。中国对应中美贸易摩擦的政策体系，需要基于经济，包括制造业、金融业和国际贸易，国际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综合的和动态的分析。昨天，孔丹先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意义，很重要。

“实事求是”是任何政策体系的前提。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距离，需要做很多宏观、微观和技术性工作。

总之，希望大家思考中美贸易摩擦，要实事求是，有大历史观，全球视野，解放思想，要避免脱离实事求是的悲观和盲目乐观。同时，任何研究都要认真和严谨，发言准备 PPT 有局限性，但是有比没有好，总比随意拿一张纸上来说两句要好的多。还有，不要轻率引入不成熟的或者过时的理论和概念。自昨天到今天，我注意到在一些发言中，轻率地引用某些所谓新概念，不求甚解，至少 10 个左右，我做了记录。不断学习和认真思考也是莫干山精神的体现。

谢谢大家。 🍷

[【返回目录】](#)

盛洪：谁和谁的“贸易战”？为什么而战？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 2018 年 7 月 4 日同步首发]



本文作者盛洪教授

当人们庆幸中美于 5 月 19 日达成的解决贸易争端的联合声明之后不久，特朗普总统就宣布实施对中国约 500 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惩罚。这很令人惊愕。这固然与特朗普的另类个性有关，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原因。回头看一下这个联合声明。虽然在题目上让人有特朗普又胜一局的印象，但仔细一看内容，却让人怀疑特朗普团队的能力。在其中，除了中国承诺多买美国产品和服务外，只有一些原则性叙述。涉及美方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指责（我在《为什么中美‘贸易战’可以转化为双赢》一文中总结为四点），只提到了“中方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也与改善现状相去甚远。而其它三点，如政府补贴，网络的数据自由流动，和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却只字未提。这显然是一个不太平衡的联合声明。

美方高度评价这次谈判的中方代表刘鹤先生，称他为“聪明人”（smart guy），“懂市场”（market guy）。也许正是刘的超常发挥，才达成了这样一个明显偏向一方的协议。然而，一个文字共识能否得

到双方的遵守，并不能靠一时的辩才，而要靠共识本身是否真正兼顾了双方的价值和利益。当特朗普团队发现联合声明强调的“显著减少美方贸易赤字”，除了有些政治得分外，并没有带来“不公平贸易”实质性的改变时，他们的反悔就可预见。然而后来美方代表到中国的谈判却无功而返。这似乎说明，中方并不打算在美国视为关键的要点上做实质性妥协。也就是说，中方坚持政府补贴，限制网络数据的自由流动，以及限制对中国市场的进入。取而代之的，是中方迅速对美方的关税惩罚作了对等的反应。美方随即将关税惩罚名单扩大到了价值 2000 亿美元。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双方不能就这几点公平贸易原则达成一致，才不惜开打贸易战。

令人惊讶的是，双方所使用的词汇又是何其相似。特朗普说，他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他所反对的是“不公平贸易”；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要“维护和捍卫自由贸易体制”，并称美国的作法是“不公平贸易”。看来，尽管分歧很大，双方都在言词上遵守自由贸易的政治正确。这应是双方的最大共识。这包含着这样的认识，即自由贸易必然是规则公平的贸易；公平贸易才可能使自由贸易带来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结果。既然都主张公平的自由贸易，那么双方的分歧究竟在哪？在这方面，中方并没有提出“公平贸易”的具体原则是什么，而美方的四点指责则把公平贸易原则具体化了。

回到教科书，公平贸易原则就是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这包括明确界定和受到保护的产权；公平的竞争者，即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应受到歧视或优惠；和市场的自由进入。如此看来，这正是美方四点指责所依据的原则。如知识产权问题，政府补贴导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及以网络为通道的市场进入和实体市场进入问题。而中国政府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构成市场公平竞争的这些原则。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上已经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并且在多个文件或场合强调保护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打破行政性垄断；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市场准入等原则。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中美分歧呢？为什么中方不接受美方关于公平贸易的具体标准呢？这中间似乎有一个巨大的利益黑洞使中方政策发生偏差。

只要我们看一下，如果不接受这几点指责对谁有利，我们就会知道黑洞究竟在哪里。如果坚持不取消政府补贴对谁最有利呢？显然是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最有利。根据我们的研究，从 1994 年至 2013 年，据不完全统计，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约为 6394 亿元。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且更隐蔽的是免费使用国有土地、低息获得贷款和低价获得资源开采权的补贴。2001~2013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应交而未交的地租约 64260 亿元；低息优惠共计约 57124 亿元；少交纳资源租金约 11138 亿元（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第二版），2015）。这种政府补贴不仅造成了极不公正的财富转移，支持了低效企业长期滞留在中国市场，而且严重破坏了中国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排挤了高效率的民营企业，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损害中国经济的整体利益。国外竞争者感到不公平的，正是这种不公平的行为通过国际贸易从中国国内市场的溢出。

再看市场进入。在加入 WTO 以后，中国已经开放了大部分产品或服务的国内市场。但仍有部分

市场没有开放。这首先不是因为要保护中国的企业，而只是要保护一部分中国的企业，即国有垄断企业。如在美方抱怨的信用卡、电信和电影领域，也是限制中国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或者是对企业产品进行审查管制的领域。在中国国内，人们为了打破商业银行、基础电信和石油领域的垄断进行了多年的努力，中共在“十九大”的报告中也提出要“打破行政性垄断”，但都没有见到实质性的进展。我们的研究发现，2003~2013年，电信产业平均每年的垄断租金约223亿元，这同时也是消费者被转移走的福利；石油行业由于垄断高价带来的垄断利润为13289亿元。因垄断了存款业务导致较低的存款利率，仅2013年国有垄断银行从全国个人与机构手中就不公正地攫取了14709亿元。显然，不开放这几个领域的市场，就是在保护垄断利益，首先损害的是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利益。

再看网络市场的进入。由于通过网络的服务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市场，所以经常被人忽略。而按经济学的看法，这不过是另一种市场，所以也应该遵循市场规则或自由贸易规则。只是网络的进入不是通过有形的关卡，而是互联网通道，所以对网络进入的限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实施。在中国，这就是所谓的“防火墙”。如果把网络世界看作市场，防火墙就是一个虚拟海关。只是这个海关不受WTO的约束，它可以在一瞬间把一种商品或服务挡在墙外，就像禁止进口某种商品或服务一样。而这种限制网络进入的情况同样存在于国内市场，只是技术手段略有不同。网络行政部门经常不经过正当的行政程序就关闭或屏蔽某些网站，或通过删除、技术故障或禁止转发的技术手段，使一些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或其它网络媒体中断运营或很难正常运营。这实际上就是在阻碍国内公民或企业正常进入到网络市场。

更不用说，对网络数据自由流动的限制还带来了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极大损害。《网络安全法》虽然宣称要保证中国公民与企业的信息安全，但由于没有用《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约束，也没有对网络行政部门的有效限制，导致该部门对网络行政权力的滥用，严重侵害了中国公民表达自由的宪法权利，起到了压制批评、掩盖腐败和打击报复的负面作用。一些重大的社会关注问题，即使只是事关名义上的民间机构，如红蓝黄幼儿园和鸿茅药酒，相关讨论也经常遭到该部门的禁止或删除。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将在网上抱怨县医院食堂饭菜的人抓进拘留所。更不用说，网络行政部门经常公权私用，腐败丛生，鲁炜只是他们的象征性代表。从而，对网络市场的自由进入和网络数据的自由流动的要求，就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国际贸易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国内市场和社会同样存在的问题。

再看知识产权问题。应该说，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有了很大改进。但从结构上看，中国推进技术创新的机制有两种。一种是知识产权制度，它在民间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种是政府补贴，即各种各样的政府鼓励科技创新的基金。这经常表现为一种寻租机制，为那些有更多政府资源的人提供机会，却很少真正起到促进创新的作用。在现有的政府机制下，政府基金很难流向有创新能力的人。汉芯丑闻说明，这种政府基金就是另一种欺诈和腐败的温床。从结构看，国有企业更依赖于政府基金，

却不能有真正的创新。他们更多地是靠购买专利获得技术，就像中国的所谓“自主研发”的高铁技术一样，只不过是依赖于中国的巨大市场带来的谈判优势购买的日本、德国和法国的技术。因而，国有企业主要不是作为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只是作为知识产权的购买者与知识产权打交道。对于它们来说，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远不如政府的科技创新基金更重要。

有趣的是，美国人并不知道中国的政府补贴究竟有何意义，所以一味地反对中国行政部门的文件《中国制造 2025》。实际上，这个文件除了大量关于未来发展的描述外，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条款就是对科技创新进行财政补贴和金融支持。尽管同时也提及了改善知识产权制度，但这与行政部门的一贯风格一样，只是一种原则性表述。据我这个还有点知识产权的人的经验，这些年来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并没有太大改进。我曾就知识产权打过两个官司，虽然都不输，但抵偿法律成本的钱一直就没有汇到我的账上。近两年来，出版社对我的版税询问越来越置之不理了，更不用说支付。美国人反对的理由是担心这个文件会给中国企业带来额外的优势，在技术上会超过美国。但实际上，这个文件真正损害的是中国的利益。它把大量资源用于寻租游戏，鼓励企业更依赖于向政府的寻租，而不是知识产权制度和市场，反过来挤掉了真正投资于技术创新的资源。

如此看来，在政府补贴、网络数据流动、开放国内市场和知识产权方面不让步，就是在维护国内垄断利益集团和行政部门利益集团的利益，就是在坚持违反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就是在违背中共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而因维护垄断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能与美国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一致，从而造成的贸易战，就不是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而是一场中国垄断利益集团与美国、中国的贸易战。这个贸易战为了维护垄断集团的利益而不惜让中国的公民和其它企业承担成本，就是一件极为荒诞的事情。正是这个垄断利益集团以阻止其它企业进入一些产业的作法攫取利益，又用垄断价格剥削更多的公民，却又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国家的利益，让那些受它们损害的人与它们站在一起维护它们的利益，天下还有比这更颠倒的事情吗？

然而，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似乎在说，这是一场美国挑衅中国的贸易战，是一场贸易讹诈，甚至是一场“贸易恐怖主义”，这显然是在为虎作伥，继续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说成是国家利益，企图借用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煽动大众，一举掩盖它们的垄断真相，并让它们天天侵夺的大众起来捍卫它们的利益。实际上，中美贸易摩擦并不是一个贸易逆差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遵循公平贸易原则-市场公平竞争规则的问题。多年来，这个垄断利益集团一直以不公平的手段，通过垄断高价和各种政府补贴吸吮着民脂民膏，一年转移财富的数量高达数万亿。对于一个中国公民，他为什么要用牺牲自己的境外市场份额或本币价值的代价，去维护税前零售价格高于主要国家 21%的成品油垄断价格，维护低于公平市场利率 1~1.5%的存款利率呢？

很显然，对中国企业和人民最有利的东西，就是维护和遵循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也就是国际贸易的公平规则。一旦打破垄断，大量被垄断排除在外的企业就能进入到各个产业，它们在制度和技术

上的优势就能充分发挥，更有效的竞争会带来更便宜的产品或服务，还能促进创新以带来更好的产品与服务；以中国人的聪明与勤奋，从来不会惧怕公平的竞争规则。历史，尤其是加入 WTO 以后的历史说明，中国人可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胜。中国人更会受益于开放的网络市场和数据的自由流动，中国人会在更严格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下焕发创新之力。因而，如果所谓的“中美贸易战”并不是两国人民的贸易战，而是中国垄断利益集团与两国人民的贸易战，是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与不公平规则的战争，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呢？

根据宪法，中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的公仆，理当从中国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应代表某个利益集团。涉及这次贸易争端，中国政府的官员还是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从习近平先生，到刘鹤先生，再到中国驻 WTO 大使和商务部官员，无不言必称“自由贸易”，“遵循市场规则”。最近发布的《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更是满篇经济自由主义词汇。他们怎么会成为美国的敌人，又何来“贸易战”？以自由贸易和市场规则来衡量，政府补贴、国有垄断集团，对网络市场和实体市场的封锁才应该是中国的敌人。

值得警惕的是，垄断和滥权利益集团有着强大的政治资源，会穷尽手段把自己的利益打扮成“国家利益”，进而影响中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因此，把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将垄断和滥权利益集团的影响清除出去，明确为公平贸易原则暨市场公平竞争规则而战，落实已经颁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实质性地“打破行政性垄断”，取消政府对垄断国有企业的补贴，用强化知识产权制度来弱化腐败的政府奖励或鼓励基金制度，拆除，至少先部分拆除网络“防火墙”，既可化干戈为玉帛，又可以公平市场原则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繁荣。刚刚看到，中国政府又缩短了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这是个好消息。再接再厉。 🇨🇳

[【返回目录】](#)

贝克利：美国领先地位的主要威胁不是中国崛起，而是地缘政治的过度炒作

[贝克利 Michael Beckley 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外交事务》，翻译：唐亦文，转载自钝角网]



本文作者贝克利

美国是一个极度分裂的国家，然而有一种观点却越来越超越两党的分歧：这个国家正面临着被中国赶超的紧迫危险。许多人认为，除非华盛顿作出更多努力来对抗其最大的竞争者的崛起，否则美国可能很快失去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根据这一新兴的共识，美国数十年的投资和外交让步帮助创造了一个地缘政治的怪物。中国如今拥有世界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它正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力量在东亚制定自己的规则，掏空美国经济，破坏全球民主。作为回应，许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同意，美国必须加强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打击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但是，这一新兴的共识与其带来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中国非但不会在经济上或军事上超越美国，相反，从衡量国家财富与实力的最重要的指标看来，中国目前都只是勉强跟随，并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进一步落后。如果美国能够避免国外过度扩张、国内投资不足，它现在是，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内继续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因此，美国的战略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做得太少，而在于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担忧反应过度。华盛顿应采取更为温和的举措，加强东亚现有的权力平衡，重振美国经济，而不是大肆宣扬中国崛起，准备进行新的冷战。为保持和平，美国领导人应拉拢而不是疏远北京，因为长期地缘政治趋势将有利于美国。

从 GDP 到净资源

常常被用作证明中国所谓不可阻挡的崛起的主要证据在于其庞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其他基本上是 GDP 组成部分的各种数据，包括工业和制造业产出、贸易和资金流动、以及军事、研发(R&D)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然而，这些总指标在衡量国家实力上都非常糟糕。正如我在一本新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这些指标未能体现过去 200 年来大国的兴衰，在预测国际争端与战争的胜负上的表现也仅比投硬币稍好。

实际上，在这些指标之下，中国曾一度处于领先地位：十九世纪，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军事力量。而且在与其它大国的贸易中保持顺差。然而，今天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屈辱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他们的国家把大块领土和大部分主权权利都输给了更小的竞争对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英国和日本。同样，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拥有欧洲最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力量，但它在对抗英国、法国和德国中遭遇了一系列的惨败，并最终导致了 1917 年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在上一世纪，苏联在包括工业产出、军事和研发支出，以及部队、核武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等各项资源总量的指标上都超过了美国。但它仍然输掉了冷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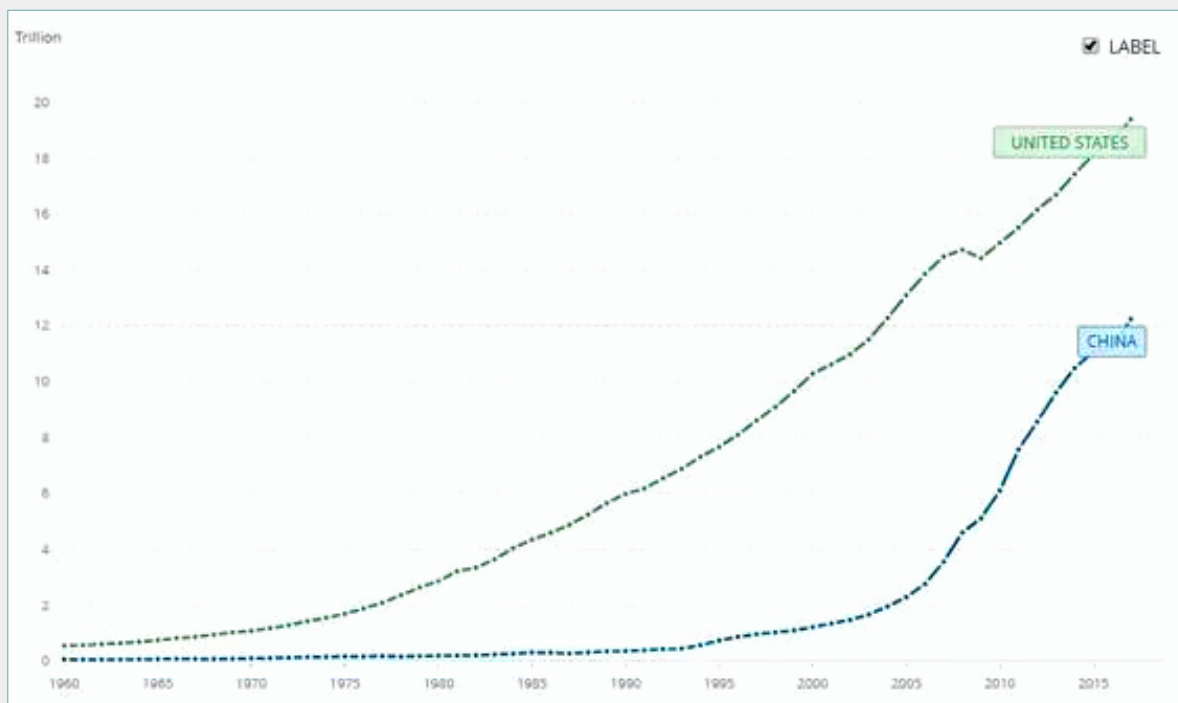
这些以及其他数百个案例说明了一个简单而重要的观点：GDP 和军费开支等总体指标夸大了人口较多的国家的实力，因为它们仅仅计算了大量劳动力和军队的好处，而未考虑到供养、管理、保护并服务这些人的巨大支出。

较大的人口显然是一项重要的资本。例如，卢森堡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大国，因为它的经济仅是世界市场的一个零头，而其军队规模甚至小于克利夫兰的警察部门。但是较大的人口并不能保证大国的实力，因为人们既生产资源，又消耗资源。10 亿农民可以带来巨大的产出，但他们也会很快消耗掉大部分的产出，留不下多少资源用于向海外输出实力。

相比之下，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国家需要积累大量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反过来，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同时拥有规模和效率——而不是只有其中之一。它不仅必须动员大量投入，还必须尽可能多地从这些投入中提取产出。简而言之，一个国家的力量不是源于其总资源，而是源于其净资源——减去制造它们的成本后留下的资源。

国家实力的成本

这一系列的成本很多。首先，生产成本，包括生产财富与军事力量所消耗的原材料，与这一过程所产生的负面副产品(比如污染)。其次，福利成本——国家为防止国民饿死街头所承担的支出，如食品、医保、教育和社保的费用。最后，安全的代价：政府必须管理并保护它的国民免于内外敌人的攻击。无需赘言，这些成本都会累加起来。实际上，它们往往会消耗掉一个国家的大部分资源。



1960 年至 2017 年中美两国 GDP 总量对比;来源: data.worldbank.org

因此，为准确判断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分析者需要考虑这些成本。近年来，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已经开展这项工作，并发布了对各国资源净储备的粗略测算。它们的分析集中在三个方面：生产资本(人造物品，如机器、建筑物、战斗机和软件)、人力资本(国民的教育、技能和工作寿命)和自然资本(水、能源和耕地)。此外，投资银行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发布了各国私人财富净值的数据。虽然这三个统计使用了不同的数据和方法，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描绘了相同的图景：美国的净资源储备是中国的几倍，而且这一领先优势可能每年都在以数万亿规模的规模扩大。

事实可能更加惊人。这些数字仅是保守估计，因为它们依赖于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而这些统计数据将中国的产出夸大了 30%，并忽略了侵蚀其财富和军事能力的众多成本。例如，为生产相同的产出，中国企业大约使用两倍于美国企业的资本、五倍于美国企业的劳动力。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工业产能被浪费。超过一半的研发支出被挪用。近三分之二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成本高于未来可能带来的经济回报。中国每年还比美国多花费数千亿美元来供养、管理、保护并服务本国国民。

低效和障碍同样拖累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平均而言，中国的武器系统在射程、火力和精确度方面的性能大约是美国武器的一半。中国的海陆空三军缺乏战斗经验，接受的训练不足美国部队的一半。此外，边防和国安至少消耗了中国军费预算的 35%，并且占去了其一半的现役部队，而美国军队则拥

有安全的基地，几乎可以完全专注于向国外输出力量。

当然，美国军队的力量分散于世界各地，而中国则集中在东亚，使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地区性大国。但是，美国在全球许多遥远角落的军事存在是一个政策导向而非必要性的问题，这意味着华盛顿可以迅速将部队从一个地区重新部署到另一个地区而不会严重危及其安全。相比之下，中国必须让大部分军队在国内保持警戒。首先，它面临的国内动乱比美国更加严重。它还与 19 个国家共享海上或陆地边界，其中 5 个国家曾在上世纪与中国交战，其中 10 个国家仍对中国部分地区主张权利。至关重要的是，其中许多国家已发展成先进的空中、海上和导弹力量，可以阻止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大部分地区建立海上或空中控制权。

总之，美国保持着对中国巨大的经济和军事领先优势。为迎头赶上，中国需要更快地增加其实力资源(power resources)。然而，不仅由于中国的巨额债务、日益减少的资源以及猖獗的腐败，更因为其萎靡的劳动力，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一些估计，在未来 30 年内，中国将失去四分之一的工作年龄人口——超过 2 亿工人——而 65 岁以上的人口将增加三倍以上。因此，中国工人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从目前的 7 比 1 缩小为 2 比 1。与此同时，美国劳动力预计将增长 30%，美国工人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保持在 3 比 1 左右。

恐惧的代价

除了以上错误之外，有成见认为，中国是一个旨在夺取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大国，这一成见带来了危险的政策影响。它给人一种美国和中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感觉，崛起的大国挑战既存的霸主，双方陷入了一场大战。这种在这两个国家都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敌意。受全球对其崛起的炒作所鼓舞，中国已经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国家领土扩张活动，对东海和南海 80%的领土主张主权，并向其军队投入大量资源。相应地，美国则将中国视作敌人，对中国商品征收严厉的关税，迫使美国国务院为军方筹集资金，让美国军队介入东亚领土争端，并制定计划一旦发生战争迅速打击中国。

减缓这种僵局需要双方采取清晰的眼光来认清现实的力量对比。中国必须承认其经济和军事力量不足以支撑领土征服和地区霸权的雄心壮志。因此，最好的选择是成为现有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另一方面，美国必须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实现地区霸权，更不用说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了。因此，最合理的路径是与中国保持深厚的经济、外交和文化联系，同时采取明智的措施来控制中国。

例如，美国应该通过帮助中国的邻国发展防御性军事能力、在东海和南海的盟军海岸部署美国反舰和地对空导弹发射器，来加强东亚现存的力量对比，而不是花费数万亿美元来打造一支 355 艘船只组成的海军。美国应该通过改革后的 WTO、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有针对性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来

惩罚中国的贸易违法行为和间谍活动，而不是匆忙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式的关税战争。美国应该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中国发起的国际组织并从内部改造它们，就像中国对待世界银行那样，而不是反对它们。美国应该利用其自由的媒体和开放的公民社会作为软实力工具来揭露和批评中国的干涉活动，而不是模仿北京关闭媒体、文化交流和社会组织来打击中国。美国应该将资金用于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研究和就业培训，而不是在国外的可疑基础设施上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反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领先地位的主要威胁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地缘政治的过度炒作，一方面为北京壮胆，另一方面鼓励美国外交冒险、导致国内投资不足。美国长期以来的接触政策(policy of engagement)也许不会使中国民主化，但它保持了美国的领先地位，并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让夸大的恐惧破坏这一成就就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最终将使美国不复安全、强大和繁荣。 ❧

[【返回目录】](#)

荣剑：中国外交格局中的“东亚突破”

[荣剑 独立学者。本文首发于《新视角》杂志总第 83 期]



本文作者荣剑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40 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中国外交主动实现“东亚突破”，大力开拓中日友好新局面和实现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无疑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中日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是东亚永久和平和东亚国际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

中国外交正面临着困境

中国外交目前正面临着极大的困境，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

毛泽东时代的前半期，外交政策选择“一边倒”，即完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基本上是闭关锁国，除了向亚非拉少数后进国家输出革命之外，主动和世界先进国家隔绝。“文革”后期，中国面临着苏联军事侵略的危险，巨大的压力之下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把美苏视为第一世界，把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视为第二世界，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第三世界。由此采取的外交政策是：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统战)第二世界，对抗第一世界(实际上是对抗苏联)。在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中国外交抓住了两头：一是和美国和解，用“乒乓外交”开拓契机，主动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取得对美外交的战略突破，一举解除了来自苏联的威胁。二是抓住第三世界，用中共自己的话说，是非洲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毛泽东的外交相比

于其内政而言，具有开放性、务实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外交遗产至今仍然还有价值。

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政策，延续了毛泽东时代开拓的近美路线：亲美亲日亲西方国家，放弃意识形态外交，走务实的外交路线，坚持对发达国家开放，对穷国小国的经济支援量力而行，开展对日对韩外交时不被朝鲜政策所绑架，奠定了东亚和平友好的新秩序。纲举目张，对美国友好是中国外交之纲。在中美友好的主基调下，中国视日本为现代化的榜样。邓小平 1978 年访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彻底打开了对日友好的大门，并从日本现代化实践中获得重大启示，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胡耀邦和赵紫阳全面贯彻了邓小平的这个外交思想。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执政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外交取得了重大突破，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1986 年 11 月 8 日，胡耀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时任日本首相首相中曾根康弘会谈

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外交政策，基本遵循了邓小平的外交路线。八九风波之后，中国遭遇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外交面临极大的困境，邓小平的外交嘱托是：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这 20 个字，核心就是“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这是中国外交的战略定位，而不是策略选择。基于此，江泽民对美外交基本上是成功的，在处理美机“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能够秉持理性冷静的立场，不因突发事件而影响中美友好大局；并在中美友好的大好形势下，完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重大步骤。胡锦涛执政时期，中美友好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优势开始发挥出来，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贸易顺差，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外汇。

从 2012 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改变了从毛泽东时代以来所确定的以美国为纲的外交路线，特别是改变了邓小平所确立的“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这是路线性和方向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中澳(澳大利亚)关系都处在比较困难的状态。

首当其冲的是，中美关系陷入了难解的僵局。目前美国朝野两党、左中右人士、亲华反华派，前所未有地对中国形成共识，一致主张对中国在世界的发展和扩张实行遏制战略。美国日趋普遍的看法是：美国原来长期对中国实行的开放、接触政策并没有换来中国制度上的变化，反而造成了中国在贸易、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各个方面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损害。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主动掀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其实影响不限于贸易领域，而是中美关系全面转折的开始。中美关系从战略合作走向战略对抗，这是中国的外交之纲从正面导向走向了负面导向，有人说这必将影响中国未来 30 至 50 年的国运，这个判断也许并非言过其实。

其次，正是受制于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南海、台海和东海三线的行动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南海“填岛”的军事行动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促成了美日印澳四国新的准同盟的军事体系，目标显而易见是针对中国的；中国大陆在台湾地区持续制造紧张气氛，客观上加强了美台关系，美国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和“台湾旅行法”，显示出美国对于维护台湾现状的坚定立场；虽然在东海围绕钓鱼岛的

中日冲突有所缓解，但冲突的根源没有消除，中日之间随时有可能爆发新一轮的冲突。

第三，中国新的国际发展战略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遭遇了各种限制性条件。中国原来一直行之有效的“以市场换取技术”（主要是针对欧美国家）、“以投资换取支持”（主要是针对欧美国家在人权等议题上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以援助换取友谊”（主要是针对非洲落后国家）的对外政策，效力在下降。欧美国家正在日益警惕并采取措施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有时甚至宁愿放弃中国市场也不愿意再继续容忍中国对欧美知识产权的侵犯（中兴芯片事件对欧美国家具有广泛的警示意义）。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提出批评，已非获得中国投资就可停止。中国用经济援助的方式来换取他国友谊的做法，在国内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

第四，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实质是意识形态外交），遭到了世界主流国家的警惕和抵制：中国号称用“中国方案”不仅要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还要解决世界问题；主张重建人类共同体却以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为导向——这种价值观外交和世界多数国家所遵循的普世价值存在抵牾。

中国外交困境源于意识形态障碍

中国目前的外交困境是如何造成的？是不是来源于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利益冲突或领土冲突？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四面为友转化为强敌环伺？

从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所获得的国家利益来看，中国自对外开放以来，一直是处在有利位置；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和多数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均处于顺差状态。按 2017 年的统计，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是 3750 多亿美元（按中国海关统计是 2750 多亿美元），对日本的贸易顺差是 315 亿美元（按日本海关统计），对欧盟的贸易顺差是 2007 亿美元（按欧盟统计局统计），对加拿大的贸易顺差是 365 亿美元（按加拿大统计局统计）。中国贸易的主要逆差国，排在首位的是韩国，2017 年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是 442 亿美元，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是 273 亿美元。从对外贸易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是独领风骚，贸易顺差占了世界各国货物贸易差额的大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可谓如鱼得水，获得了各种好处，国家利益有了巨大增长。

从中国的领土主权来看，自从 1979 年中国和越南之间发生的一次边境局部战争后，中国近 40 年来没有和世界上的主要贸易国家发生过领土争端，尤其是和美国迄今没有发生过领土冲突。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支持一直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挑战，但美国政府反复声明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是反对中国大陆以武力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这是美国政府长期一贯的立场。中国和日本围绕钓鱼岛展开的冲突，是一个历史问题，长期存在，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执政时期，并没有成为中日和平友好的障碍；如同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侵吞了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国对俄罗斯仍然采取友好的立场，这说明历史遗留问题在现实的国家利益面前并非不可化解。基于

同样的道理，中国和印度的边境纠纷时有发生，但中印目前几乎没有因为边境纠纷而再次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因为战争不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美国、日本、欧洲等主流国家并未发生国家主权或领土的武力冲突，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是得益国家。中国最近二十几年来的迅速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条件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采取了大力支持的立场，通过各种方式促使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利益结构中一直处在有利位置。因此，不是改变而是继续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将对中国有利。中国即使和美国发生贸易战，或者和其他国家处在利益冲突状态，这些利益矛盾和冲突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常态现象，可以通过国际公法和各种国际组织的相关规则来予以处理和解决，不足以造成中国目前的外交困境。

中国外交困境的根源在于，近五年来实行的是一条意识形态导向的外交路线。

(1)中国对朝鲜的外交路线和政策，是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东体制崩溃之后，世界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已经日渐稀少，中国至今仍然把朝鲜视为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从共同的意识形态出发，中国对朝鲜一直采取支持的立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援助，从粮食、石油到军事装备，几乎应有尽有。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的强大支持，朝鲜才有恃无恐地发展核武，从而构成了对东亚和平的严重威胁。在目前朝鲜是否弃核的关键时刻，如果中国依旧秉持意识形态的外交路线，彻底解决朝核问题将会面临诸多难以解决的障碍。

(2)中国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从反美的意识形态出发，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长期实行对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政策。在联合国安理会多次就叙利亚局势尤其是就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旨在通过美英法联军对叙利亚实施制裁和军事打击的决议草案时，中国成为少数投反对票的国家。目前美国和伊朗关系处在战争边缘状态，美国要求国际社会统一制裁伊朗，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邀请伊朗外长访问中国。中国的这个外交姿态，会被美国人解读为是中伊联手来对抗美国。

(3)中国对俄罗斯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一方面是基于俄罗斯和美国的对抗性关系，期待俄罗斯在和美国对抗时寻求和中国建立一种战略同盟型关系，中国在对抗美国时也期待获得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另一方面是基于前苏联体制遗留下来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普京的个人集权所包含的精神和传统，让中国的领导人有同道者之感。

(4)中国对日本的外交路线和政策，是基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年来中国民间发起的反日运动，是中国政府和官媒长期宣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果。东亚的政治动荡，一方面是朝鲜拥核引起的，另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惹的祸。中国的民族主义喧嚣，从客观上助长了日本政治的右翼化。围绕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参拜和钓鱼岛主权之争所持续展开的中日外交之争，时而沉寂，时而热闹，完全是源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并非是国家的利益冲突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5)中国意识形态外交的总根源是对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偏见。美国虽然是中国最大贸易国，给

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但是,中国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长期以来将美国树立为海外敌对势力的总代表,总是认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中国以朝鲜、叙利亚、伊朗、俄罗斯这些国家为友,和日本对抗,反对在韩国布置萨德导弹系统,完全是以美国划线:视美国的敌人为友,视美国的朋友为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关系,虽然谈不上是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这是中国一直期待建立的关系),但至少能够和平相处,现在因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巨大鸿沟,中美的战略对抗已近乎形成。

中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实质,是中国的价值观外交,这一价值观的核心是: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中国要主导世界秩序的重构,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的领导国家。中国的意识形态外交还能不能继续走得下去,应该反思了。

“东亚突破”的核心是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

中国目前的外交困境证明,意识形态外交已经碰壁。举目四望,还有多少国家是中国的真正朋友?按照“三个世界”划分,失去了美国这个“第一世界”国家的支持,也就是失去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支持,而要获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中国则要花出多少钱?以金钱换来的支持又有多大的可靠性?按照邓小平所确定的外交路线,“韬光养晦”不仅仅是中国的外交策略而是战略定位,中国不管是从实力上看还是从价值观上看,都不足以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决不当头”应该是中国外交的长期选择。

中国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必须要有根本性的调整,调整未必是要回到“三个世界”理论,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世界的划分不再是简单地以国家大小穷富为界线,而是还要以各国都要遵循的共同国际规则为基准——从联合国宪章到世贸组织所确定的基本规则,是现有国际秩序赖以形成的共同基石。任何国家,包括中国,要想另起炉灶,用自己国家的一套价值标准来重新建立国际秩序,那相当于和世界的国家为敌。现在需要调整的是,重新回到邓小平所奠定的“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上来,在战略高度上重新认识中国的外交之纲: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基于中美和平友好的战略格局,才可能真正打开中国的外交空间。

外交路线和政策的根本调整,除了要在意识形态的困境中走出来之外,需要在外交实践上有大的突破。如同毛泽东时代中国主动寻求与美国的和解从而一举解除了外交困局,中国目前也需要有这样的外交突破。事实上,中国外交并没有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在所呈现出来的世界主流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友好状态,是中国意识形态外交所导致的结果,是中美两国由战略合作走向战略对抗的结果。在中美关系陷入极大的僵局时,中国外交率先在东亚突破,重新寻求和日本真正建立一个和平友好的关系,同时也和韩国彻底恢复原来的友好状态,是中国迅速摆脱外交困境的当务之选。

中国外交困境在客观上为改善中日关系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国际条件。在中美关系处在僵持状态时,

中日关系率先突破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从外交策略上考虑，中国如果不能首先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就不能取得和美国改善关系的有力地位，而中日关系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无疑具有最重要的位置。中国古代外交策略推崇“远交近攻”，这是基于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领土扩张和防守的需要，在现代地缘政治中，“近交”才能“远攻”，只有处理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才能掌握世界外交的主动权。今年中日关系开始改善，和中美关系趋于紧张是有关联的。如果中美关系继续处在紧张状态，中国政府寻求“东亚突破”的动力会更大。

中国在国际压力之下寻求“东亚突破”，肯定有利于东亚和平与东亚的国际秩序。这要取决于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包括韩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按 2015 年公布的经济数据统计，已超过了 16 万亿美元，总量超过了欧盟，占世界总量的 20.9%，亚洲的 70%。2015 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2016 年，中国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而韩国则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日韩三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共同体，经济关系如此密切，同时又有着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作为共同的文化资源，从历史到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基于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关联性，中日韩和，三国肯定是共赢，中日韩斗，三国都是输家。因此，中国外交政策的“东亚突破”，符合中日韩三国的根本利益，符合东亚的稳定和发展。

中日两国关系的再正常化，是中国外交“东亚突破”的核心。所谓“再正常化”是指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出现的不正常的两国关系的再调整，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化的轨道上来。中日两国之间原来基于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所形成的长期矛盾和冲突，必须有一个总体性的解决方案，这是中日关系再正常化的基本要求。中日关系不能仅仅从策略上考虑，而是要像 20 世纪 80 年代那样，从战略高度上奠定中日长期友好关系的基石。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中美关系是纲，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目，那么，在东亚范围内，中日关系就是纲，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就是目。纲举目张，通过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矛盾就能迎刃而解。

中国外交的“东亚突破”，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要解决朝鲜的拥核问题。目前对东亚和平和东亚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就是朝鲜已经拥有了核武能力，这是中日韩三国的心头大患。决不能让朝鲜拥核成为无法改变的既定现实，而由中日韩三国采取共同行动迫使朝鲜去核，是当务之急。解决朝鲜核问题，中国肯定具有关键性或决定性作用。美朝元首会晤之后，用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已出现了良好开端，但最终能否迫使朝鲜彻底弃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采取和美国一致的立场，这也是中国外交“东亚突破”的关键一步。惟有彻底解决了朝鲜的核问题，中国在世界才能真正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在东亚才可能真正行使有影响力的话语权。

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外交策略，而是要致力于真正实现 20 世纪 80 年代时所确立的“中日两国要世代友好下去”这一长远目标，为此，必须对横亘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三大障碍——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有一个总体性的解决方案。在 20 世纪 80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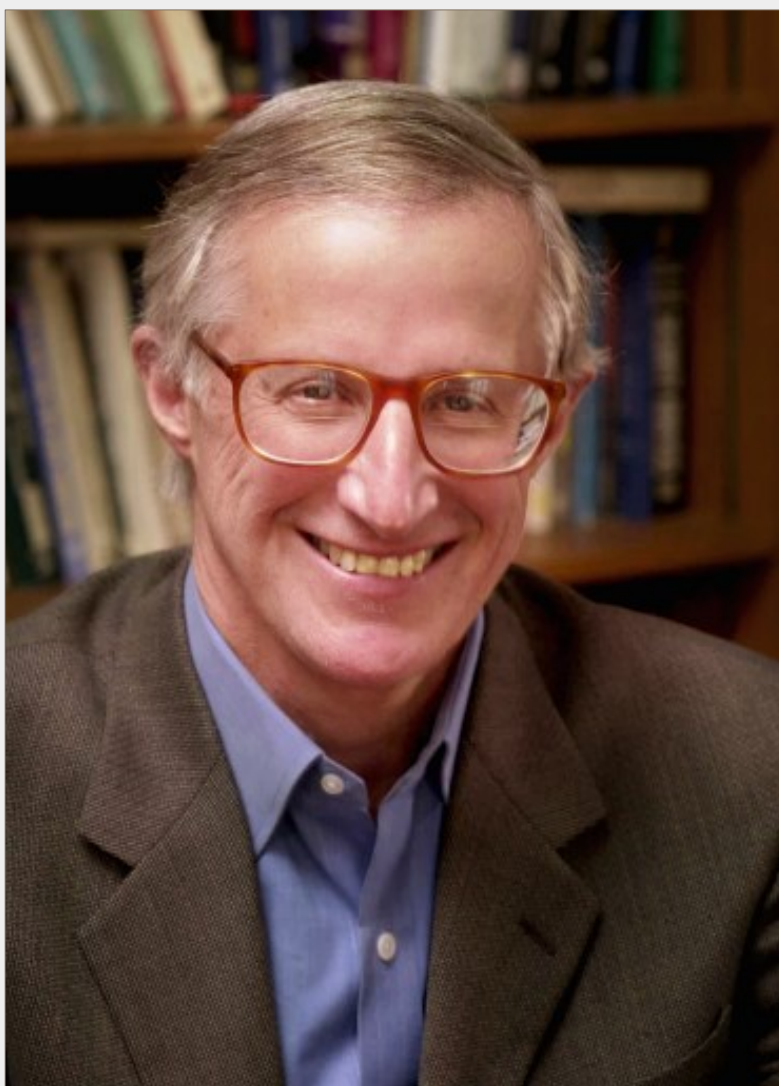
时，这三大问题都存在，但中日两国领导人都能够基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中日友好的大局，存小异，求大同，不激化矛盾，不把问题意识形态化，不诉诸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加强官方互访特别是高层互访的同时，扩大民间的交流和来往。正是基于中日两国领导人对于中日长期和平友好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的中日两国国民的互相好感度都高达80%，使中日两国进入了自隋唐以来最友好相处的年代。这说明，中日两国之间客观存在的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不能也不应该成为阻碍中日友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现在的中日两国领导人，应该有政治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暂时还解决不了，那就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先“搁置争议”，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总之，不能把问题当作包袱背起来，而是要卸掉包袱，尽可能轻装前进。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中国外交主动实现“东亚突破”，大力开拓中日友好新局面和实现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无疑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中日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是东亚永久和平和东亚国际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的战略地位。当然，中日关系要有根本性的改善，要彻底地再正常化，取决于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取决于中国从意识形态的外交困境中走出来，取决于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和根本改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中日两国持续友好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

[【返回目录】](#)

冯兴元：把气候变化整合入长期宏观分析之中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的学术贡献与反思

[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首发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深圳特区报》]



威廉·诺德豪斯 [William D.Nordhaus]

全球气候变化宏观经济学的权威专家，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一，诺德豪斯的贡献在于把气候变化整合入长期宏观分析之中，而罗默的贡献则在于把技术创新整合入长期宏观分析

10 月 8 日，宏观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 (William Nordhaus) 和保罗·罗默 (Paul Romer) 教授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位大家的姓氏蛮有意思：诺德豪斯这一姓氏应该源自德语，意指“北屋”；罗默这一姓氏意谓“罗马人”。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新闻发布稿，诺德豪斯的贡献在于把气候变化整合入长期宏观分析之中，而罗默的贡献则在于把技术创新整合入长期宏观分析。

人们对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已经比较了解。其实内生增长理论的创立人也不是罗默，而是熊彼特。熊彼特认为：“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而并非外部强加于它的”。这种发展也称为“创新”。创新带来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必然蕴含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不一定意味经济发展：单纯依赖于投入增加的增长不是发展。罗默的贡献在于给熊彼特的文字演绎逻辑加上数学的外衣。归根结底，他是对数学的贡献，而非对经济学的贡献。另外，在市场经济里，知识的累积导致创新，创新导致增长，这是明摆的，不需论证。当然，加上数学进行形式化也是很有意思的。即便如此，其原创性则不见得有多少。

人们了解诺德豪斯，大多是因为接触过他作为第二作者与保罗·萨缪尔森合著的较新版经典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较早的版本是萨缪尔森的独著。按照萨氏的说法，他自己年事已高，希望他的教科书可以常葆青春，因此希望有一位优秀的合作者来帮助他继续修订这部巨著。经过仔细物色，萨缪尔森最终决定由诺德豪斯教授来充当这个光荣的角色。于是，诺德豪斯教授的大名，也就随着这部经济学巨著的引入，而被中国的读者所认识和熟悉。不过，虽然诺德豪斯教授的名字早已被广大读者所熟识，但他在全球气候变化的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上的主要学术贡献却很少被国内读者知晓。我个人最早认真阅读的经济学教材就是这部《经济学》。它长期被国内经济学界的很多学者视为圭臬。

我个人最初接触经济学，就是从这本书开始。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后来我因为工作原因，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有所关注和研究，了解到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哲学基础存在三大来源：德国的弗莱堡学派，社会主义，以及基督教伦理，再了解到德国弗莱堡学派创始人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而且政府必须在法治国的框架内运作，而构成竞争秩序的原则包括：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前后一致性。这里的经济政策，并不是诺德豪斯《经济学》大作中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是指维护好竞争秩序的“经济秩序政策”。德国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实现“经济奇迹”就与其以普适方式推行竞争秩序有关，而与推行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不大。从那时开始，我就对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经济学》教科书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宏观调控政策产生了怀疑。

二，诺德豪斯是全球气候变化宏观经济学的权威专家，他在能源利用、气候变化等方面的著述颇丰

后来我接触了米塞斯所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则更是彻底放弃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也称总量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所谓“新古典综合”中的核心内容。它的方法论包含很多具体缺陷，比如书中的“社会总福利”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每个人对一个事件的主观价值判断不一样，对于一个人是得益，对于另一个人可能是损失。社会福利函数预设每个人的

福利能够加总，其实这也是有问题的。其意蕴是政府官员可能以公共利益的代表出面，以其个人的偏好来充当往往不存在的某种统一的、加总的“社会偏好”，以这种“社会偏好”替代整个社会中所有人的偏好，推行一系列侵犯产权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如果这个官员通过公共选择程序来推行这些政策，那容易成为“多数暴政”，比如奥巴马的医保改革政策。宏观经济学里包含的宏观调控政策，关注宏观层面的 GDP 总量的增长，而置微观层面的私人产权保护于度外：政府不断改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短期相机抉择，其结果就是不断影响和改变微观经济主体的产权状况。比如政府投放更多的货币，会导致通货膨胀；政府扩张投资，往往会挤出私人投资。宏观调控政策相当于马车夫赶马车，要求马车跑得快，而不管前面撞死撞伤撞坏多少人，不管马车掉下拉下拖着多少人。

诺德豪斯在学生年代参加过耶鲁大学詹姆士·托宾教授的课程，接受过麻省理工学院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等教授的指导。1967 年，诺德豪斯从麻省理工毕业后，回到了母校耶鲁大学任教，从助理教授一路做到了教授，至今仍在那里担任终身教授。他在接到诺奖通知的当天，还照常到大学课堂上课，并且还因此推迟了记者招待会的时间。

诺德豪斯是全球气候变化宏观经济学的权威专家，他在能源利用、气候变化等方面的著述颇丰，包括《能源的有效利用》《改革联邦政府的管制政策》《管理全球公共事物》《全球变暖》等等，不过国内中文读者还无缘拜读这些著述。他认为政府应该采取行动阻止气候的不利变化，容忍一定程度的全球变暖。他不主张“零碳增长”，考虑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所提倡的全球气候变化议程所可能带来的成本。他认为，允许全球气温上升 2.3 摄氏度是最优的。诺德豪斯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全球变暖论点怀疑论者，还主张将全球普遍征收的碳税作为其气候政策建议的核心。

三，无论气候变化议程是否属于真命题，资源节约利用和防治环境污染本来就应该推行

不过，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所推行的气候变化议程很可能是伪命题。全球大概有一半的诺奖得主对气候变化议程持怀疑态度。气候变化议程的支持者认为，是人类活动造成了大气层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从而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造成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含量变化的因素很多，比如长期性海洋温度周期、太阳温度转变等。气候变化的影响因子繁多，二氧化碳含量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影响因子的数据，包括历史上的各地气候数据和二氧化碳排放数据都严重缺失。

诺德豪斯教授即便是个天才，也无法构造这么复杂的模型来预测全球气候变化。这种预测可以说是犯了哈耶克所批评的“知识的僭妄”。实际上，选择历史上的不同时点作为起点，其对气候变化预测的结果也会不一样：选择这个时点，预测结果可能是气候变暖，选择另外一个时点，预测结果可能是气候变冷。气候变化议程的支持者最初强调气候变暖问题，但是后来也有人提出，换取一个时点作为考察的基年，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气候变冷。为了防止遭到这种或者那种的指责，气候变化论者用对气候变化的双向关注（从而不管是气候变暖还是变冷，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来替代对全球变暖的

单向关注。而对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成员和各国负责气候变化议程的官员，以及很多研究气候变化的学者来说，气候变化议程能够带来大量的行政或者研究经费。

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柯里认为：“要改变 1980 年后气候暖化的指标，考虑自然内部变量作为基本要素。”自然变量是指不受人为因素影响的条件，如上述长期性海洋温度周期、太阳温度转变等。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专家琼斯认为，如无大规模发生厄尔尼诺现象，全球变暖将暂停一段时间。

1974 年与缪尔达尔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在晚宴上以“知识的僭妄”为题作获奖致辞，提出了对设置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担忧。他认为，假如事先向他征询，他会毅然决然地建议不要设立此项大奖。他强调的唯一理由是，该奖将一种巨大权威授予一人，这在社会科学当中，会转化成获奖者的理论和思想对外行产生不应有的强烈影响。诺德豪斯教授肯定才华横溢，但是他的研究方法及其预测力可能不足以让他作出多少有关气候变化的精准预测。对气候变化宏观经济学家授奖，确实会造成哈耶克所担忧的问题。哈耶克认为，社会科学或者经济学的预测往往只是一种“模式预测”：我们的预测能力也仅限于预测事件中的这些一般特点，其中并不包括预测每个具体事件的能力。

人类的碳排放多了，与 GDP 的增长基本上正相关，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气候变暖的一个相关因素，这个结论可能没有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属于某种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一结论估计也没有问题。因此，从审慎角度来看，对之做一些未雨绸缪的关注和研究仍然是有益的。但是人类试图要精准预测全球气候变化，那确实是“知识的僭妄”。

无论如何，我们要把气候变化议程的支持或者反对与资源节约利用和防治环境污染分开来看。无论气候变化议程是否属于真命题，资源节约利用和防治环境污染本来就应该推行，即便存在新的资源的可能性。对气候变化议程保持怀疑，同时给予适度的关注和研究，倒也无妨，乃属审慎之举。 ■

[【返回目录】](#)

郭于华：克服社会恐惧症

[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首发于《社会学家茶座》总第 39 辑]



郭于华教授

这里所讨论的社会恐惧症状不是一般心理学或精神医学意义上的“社会恐惧症”——社交恐惧与焦虑，指与他人交流和相处的障碍，而是指对主体性社会的恐惧、怀疑，将其视作具有破坏性的威胁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来，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一直未能建立起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恐惧症”，即对独立于市场和政府权力之外的主体性社会的恐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培育、建设和发展主体性社会的拒斥。

我们究竟惧怕什么？

社会恐惧症与社交恐惧症虽非一事，但却有类似的心理机制，都是将尚不存在或可能发生的事物妖魔化，预设洪水猛兽，想象其导致可怕的后果。社会恐惧症是将社会本身妖魔化，而其悖谬在于，人本来是社会性动物，离开社会关系网与正常的社会生活人无法作为人而生存。举例来说，发生在富士康的十几起青年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和出现在不同地区的丧心病狂的屠童案，都与社会性的丧失不无

关系：前者是在半军事化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控制下，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孤独、冷漠、脆弱的原子化个体，在资本与权力双重压迫下走投无路而选择轻生；后者则是因缺失正常社会生活与社会支持而形成反社会人格、并以极端暴力报负社会的恶性事件。既然社会生活对于人类不可或缺，我们却如同中邪一般地惧怕社会又是为何呢？对此可以从权力和公众两个面向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理解。

统治权力自视为无所不能、能处不在的力量，试图包打天下，是造成社会羸弱和社会恐惧症的首要原因，对此可以从社会治理的历史过程来看。1949年以后，我国在应对近代以来总体性危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合一的总体性社会。这样的总体性社会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来的。除了资源垄断制度之外，在组织结构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城市中的单位制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通过这两种基本制度，国家不但将全体社会成员高度地组织起来，而且通过这两种垄断性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与服务的分配组织，造成单位和公社的成员在多方面严重地依赖于组织亦即对国家的依附。与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同样重要的是户籍制和主副食品的配给制度，一个人只有在这种户籍制度中获得了一个合法的身份，才能成为城市中的某个单位中的一员或是农村中的某个人民公社的一员。而如果丧失了这种由户籍制所赋予的合法身份，人们将无法接近由国家所控制、由单位或人民公社来具体分配的那些机会和资源。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对社会的总体性控制，消除任何带有独立倾向的社会力量就成为必然。1949年以后，对宗族、民间信仰及秘密会社的打击和取缔，摧毁了民间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和力量。土地改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时也将其掌握的资源转移到国家手中。包括反右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使知识分子自近代以来刚刚开始形成的一点独立性荡然无存。在另一方面，则将各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等形式吸纳到体制结构中来；工会、妇联、工商联等群众团体亦处于国家的直接支配之下。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处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已经不复存在。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局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经济自主提供了契机，使得经济逐渐从国家的全面掌控中被释放出来，开始尝试着按照市场的原则运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为社会的发育和自主性提供了契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也在开始缓慢生长，一种更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渐形成。人们依稀从加速发展的非政府组织中、从新兴的城市社区中，或是从各种各样自组织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中，看到了社会空间的有限开放和中国公民社会生长的可能。

但是，近年来，伴随着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以及在此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一种相反的趋势也正在出现：我们这个国家似乎正在重新开始依靠权力来解决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试图用权力来包打天下的努力处处可见。而在社会生活领域，某种似曾相识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氛围正在被重新营造起来，权力主导一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以压制社会为代价扩张和强化权力的迹象清晰可见；在某些地区，

权力的任性、霸道和恣意妄为显露得越来越明显；以权代法，重申法律为政治服务的趋势开始出现，以至有人认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中国的法治出现了明显倒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强化权力的过程甚至是在“社会建设”的名义下推进和展开的。

阻止社会的成长出自于大一统的治理思路。怕乱，惧怕多样性和多元社会带来混乱与不稳定。以为回到总体性权力就可以维持社会稳定，造就社会和谐。

来自于权力的社会恐惧症必然影响到普通民众。如果说权力对社会的恐惧表现为怀疑、排斥和否定社会自主性，限制、打压或吸纳社会的自组织，那么大众对社会的恐惧则更类似于医学意义上的心理恐惧症，其表现为：逃离公共领域、切断社会联系并禁闭自身。这种病症是由于长期以来总体性权力的强制性和不受约束造成大众对于单一权力核心的信奉与依赖，形成总体性权力是社会稳定之必要条件的迷思，因此造成对社会自主性的怀疑和否定。而权力对社会自组织的负面定义和高压维稳也必然造成大众在表达、追求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诉诸总体性权力的记忆与实践，从而主动避免公共参与和形成社会自组织。

权力与大众对社会的恐惧及其相互作用形成了整个社会对社会自主性和自组织的排斥与否定，这是自主且自组织的社会在当前中国缺失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离不开社会

站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我们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产物的包打天下的总体性权力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一个疲弱、被动的社会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总体性权力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在特定历史阶段，总体性权力也许是社会有序与稳定的前提和保障，但是在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面对层出不穷、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总体性权力不仅应接不暇，而且因其自身缺少制约、官僚化、简单化等缺陷，反而会成为社会失序的根源。

回顾一下世界范围内社会进步的历史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或许是有利的。在近代历史中，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在与社会进步的互动中得到完善的。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转变过程中，总是有“社会保护运动”与之形影相随，交互作用。比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由于财团和寡头垄断，权力与资本结合，官员腐败十分普遍，劳资矛盾尖锐，贫富差距加大。而从 1900 年到 1917 年，美国兴起了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反垄断、反特权、反歧视；争取平等权利、改善工人待遇、缓解劳资冲突；开展社会慈善运动、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这一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抑制权贵经济、进行政治改革、重建法治规则、商业道德和社会价值的社会进步运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日后美国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人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进程并没有如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因其“内在动力最终会破坏它自我再生产的条件”而走向必然的衰落。相反，资本主义似乎有着更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结构也不是变得更为简单和更加两极化，而是变得更加复杂和愈加分化，阶级斗争也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的真实轨迹”并未提供支持马克思论断的证明，这恰恰是因为社会、特别是公民社会的存在和作用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持续和发展。

对此，倡导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布洛维评论道：“经典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料到，资本主义内部发展出的社会再生产的多种机制会那么有活力、有弹性和有效力”。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分析，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民社会与能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公民社会成为国家和日常生活进程相联系的一个新的斗争场所，使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利益得以协调。既与国家合作又具有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的结合，稳定了阶级关系，又为挑战和发展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遏制了革命趋势。资本主义延续的另一原因，正是通过能动社会来抵御过度市场化、商品化的毁灭性后果。能动社会是以自由权利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保护运动，其意义在于保护社会的结构，保护维持公平正义的条件，制约具有毁灭社会倾向的市场力量，避免社会被市场所吞没。美国当年之所以能走出大萧条，并不仅仅是由于实行凯恩斯主义，由政府干预经济，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制度的建设”，“通过重建社会来拯救经济进而重建资本主义”，“将一个赤裸裸、血淋淋、人吃人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变为有福利制度和公民社会来保障的、可持续的现代资本主义”。历史证明，一个健全的社会，对于日常生活秩序的形成，对于公平与正义的维护，对于形成市场经济的良好社会基础，对于防止社会结构两极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应当看到，即使到今天，这种建设社会、保护社会的努力仍然没有停止。有学者认为，近些年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的力量在急剧扩张，同时社会也在继续努力，以抑制资本的过度膨胀。近几年中，社会保护运动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有人据此将其称之为后全球化时代。2007 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引起人们对不受规制的市场力量的怀疑。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政党甚至明确提出了“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主张。这进一步表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的角色关系：社会是用来与市场相抗衡、矫正市场消极作用的；而国家的重要角色之一则是采取措施以保护社会免受市场侵袭。

如果社会建设对资本主义都如此不可缺少，我们作为以社会主义制度立国的国家又为何要惧怕社会呢？

没有社会才更可怕

权力惧怕社会是出于自保而产生的对于社会的误识 (misrecognition)，而公众对社会的恐惧则来

自于权力制造的虚假意识 (false consciousness)。如此上下互动必然形成社会建设的误区和阻力，不利于落实党提出的“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的重要方针。

社会建设的阻力之一是高压维稳，其结果是造成“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近年来大量的案例表明，旨在消除不稳定因素的维稳工作，实际上已经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其重要原因在于，现有的维稳思路往往是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的。于是，越是要强调社会稳定、强化维稳工作，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越是不能容忍民众的利益表达；民众越是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就越是倾斜，尤其是底层群体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利益格局越是倾斜，利益矛盾和冲突也就越尖锐，不满情绪也就越强烈；由于正当的利益要求受到压制，一些群体或个人就只能采用体制外的方式、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于是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社会矛盾越是激烈，政府就越是要强化维稳工作，从而形成一种不稳定的恶性循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没有出口，无论是信访还是报刊，无论是网络还是社会组织，都难以成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有效渠道。实际上，当我们以稳定为由不允许农民工组织起来集体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不允许被拆迁户就拆迁补偿进行讨价还价之时，维稳实际上已变成维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法企业和承包商利益的工具，成为维护开发商掠夺被拆迁户利益的工具。

高压维稳还不可避免地造成体制性防卫过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而这种高度紧张、过分敏感状态会导致权力滥用——以维稳的名义不作为或者胡作为，必然带来更多更尖锐的矛盾与冲突。高压状态下的社会是很僵硬的，缺少弹性，因而必然也是很脆弱的。正常的公民社会实际上是能够在紧张、僵硬的关系中起到缓冲、和解作用的，公民社会越强大，发育得越好，社会其实是越稳定的。而在国家、市场、民众中间没有这个公民社会，刚性的稳定就会是很脆弱的。失衡的利益关系，断裂的社会结构，使任何一个偶然性事件都可能成为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导火线。而直到今天，在关于社会的本质、作用和意义上还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在有些人头脑中，社会似乎总是站在国家或体制对立面的敌人，甚至被一些地方官员视为洪水猛兽。“社会”这个团结、稳定、和谐的最重要的组织和机制被视同异端，成为与其特质相悖的负面因素，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

由此可见，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破除社会恐惧症，为社会正名，肯定社会的主体性，认识社会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允许社会的自组织，实现社会的自治与自律。具体而言，自治的社会首先是一种利益凝聚机制和民意表达机制，只有经过凝聚和提炼的利益诉求才能接近政府决策的层次，而分散的、散射的要求是很难在决策层面上进行处理的。利益要求的凝聚和提炼，必须以一定的组织形式作为载体——以有组织的方式增加公众参与的环节，如用听证、表意、监督、举报等方式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上给人们表达的渠道和机会。由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所掌握的资源 and 表达的能力都存在很大差异，

组织起来的集体表达、沟通与协商对于弱势群体就显得尤为必要。经验表明，经过凝聚的利益诉求和有组织的民意表达也更容易通过谈判和仲裁等和平理性的方式获得解决。

自治的社会同时也是相应的施加压力机制。当今的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已经有了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群体拥有的资源多，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手段也多；而弱势群体要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必须得有特殊的施加压力的机制。当然对施加压力的机制需要用法律法治加以规范，但如果根本没有这样的机制，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行之有效的施加压力机制，应当包括集会、游行、请愿和罢工等有组织方式。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常见的劳资矛盾中，劳方往往在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方面均处于显著劣势，罢工是其最后、但也是最为有效的施加压力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若能转变成常规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是大规模的罢工、示威也不会对社会的基础秩序造成整体性冲击，反而有利于及时释放和消解掉那些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紧张。

构建和谐社会亦即建设主体性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是社会主体性的基础，社会组织是社会主体性的载体，而社会制度则是社会主体性的保障。其终极目标则是形成建立在有限的政府、有边界的市场与自组织的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制衡与良性互动基础之上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锻造公民、培育自组织的社会、争取信息透明和民意表达的渠道，使社会成为实在。这一切都有赖于自觉的公民、公民权、公民意识的生产，而这一切的前提须从破除社会恐惧症开始。 ■

2011年3月6日

[【返回目录】](#)

雷颐：梁启超与哈耶克

[雷颐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本文转载自“雷颐游走古今”微信公众号：lyyzgj]



本文作者雷颐 图片来源：中评网

梁启超是现代中国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从戊戌维新开始就是思想界的重镇，几乎所有重要思想的生产、引入、争论，无论是赞同还是坚决反对，他都不同程度卷入，不是领军人物起码也是主角。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异军突起，思想界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激烈论战。作为文化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梁启超当然也是这场重要论争的主角之一。

对社会主义思潮，梁启超早就有所了解，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介绍者之一。在 1906 年与革命党辩论时，他就对同盟会中某些人主张建设“社会国家”的主张提出质疑：“即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杂答某报》）

看官须知，此话写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十年之前，也就是说，在尚无任何“实例”可供参考借鉴之时，他仅凭只言片语就能看到在这种体制下所有权力都为国家所有、个人将无任何权利的巨大危险，确实深具洞见。当然，这只是他的“洞见”，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继续作深入的学理上的研究探索。

近四十年后，原籍奥地利、后加入英国国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在 1944 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

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从经济学、社会学和知识论等诸多方面探索这一问题。

他论证说：“在一个经济生活受到彻底管制的国家中，甚至形式上承认个人权利或少数人的平等权利都会失去任何意义”；“由于在现代条件下，我们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别人来提供手段，因而经济计划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我们的原始的需要到我们和家庭、朋友的关系，从我们工作的性质到我们闲暇的利用，很少有生活的哪一个方面，计划者不对之施加‘有意识的控制’”；“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垄断者时，我们将唯他之命是听。而指挥整个经济体系的当局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垄断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6、91、92 页）



梁启超

当然，除了学理深厚外，哈氏比梁启超有利的一点是，此时毕竟已是“二战”末期，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和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特点已充分显露。此后几十年，哈耶克穷比之精力致力于此，巨著不断，终成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

无论怎样，梁启超的“洞见”虽然早于哈耶克几十年，但毕竟只是“思想的火花”而无深刻的学理支持，其思想、观点自易因时代、社会剧变而变。何况，20 世纪上半叶是“革命的年代”，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更是风起云涌，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1919 年漫游欧洲之后，梁启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在《欧游心影录》中敏感地提出“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

他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

梁氏所言很快得到印证，20 世纪的历史，证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别国”，确实深受十月革命影响。但是，梁启超同时认为，当下的中国要走社会主义是“搔不着痒处”。因为“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



哈耶克

但“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

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机关”国有论在欧洲是“救时良药”，但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如铁路国有“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但此时的中国早已实行了铁路国有但“结果如何”？他认为“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所以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若提倡“生产机关”“归到国家”，他“头一个就反对”。

在 20 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长文，支持张东荪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论战，反对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

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当下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产生，远未发达，无产阶级更谈不上发达。中国当下的主要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外国的

压迫，是劳动者很难在现代新式工业生产中找到工作，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吾认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者阶级”。“故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中国当前的任务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发展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欧美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在如何能够使更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

他自注道：“此劳动者指新式工业组织之劳动者”，即无产阶级。他承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所随带之罪恶，自必相缘而生”，会有种种“可憎可恶之畸形发展”。但资本主义“从一方面观察，极可厌憎”，“从他方面观察，又极可欢迎”，对中国来说是“利大于弊”。现在，“资本阶级将兴于中国，其机运已经成熟，断非吾侪微力所能抗拒”。

他写道：“以社会主义运动之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而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藉……”但他又承认：“资本主义必非社会终极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所谓过渡，当然是指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表明，此时他已未如自己 1906 年那样、未如后来的哈耶克那样，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而是承认所有国家、社会的最终目的仍是社会主义，只是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而已，只有先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有开始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最终，还是要“过渡”到他曾经不赞成的由国家掌控一切的社会主义。

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中国思想界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者其实并不多见。或许，这也是当时的世界性潮流，所以哈耶克备受冷落几十年也就不难理解，而他能几十年坚持己见、不断探索，也委实不易。

不管梁、哈观点的变与不变，社会主义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的基础之上，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梁启超实际提出了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却一直到了“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引起理论界注意，并成为长期引起激烈争论的“热点问题”。

现在，无论人们认为他的观点是对是错，是赞同还是反对，都不能不承认他提出的是一个紧扣中国社会实际的“真问题”。遗憾的是，在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他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反对者在对他的观点作总体批判的时候，根本未重视这个问题内涵的深刻意义。或许，只有经过曲折探索、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能重视、体会梁氏几十年前所论的深意所在。 ■

[【返回目录】](#)

周保松：自由比容忍重要 | 怀念高锟校长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首发于2018年10月2日《明报》]



高锟 [1933.11.4—2018.9.23] (左) 在诺贝尔颁奖仪式领奖
华裔物理学家、教育家，光纤通讯、电机工程专家，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
200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010年获颁大紫荆勋章

高锟校长逝世后，我偶然在《壹周刊》网页读到一篇陈惜姿写于1999年的高校长专访，上面有一张一般读者不会留意，但却教我难以平静的照片。

照片中的高校长，身穿深色西装，双手拿着一册刚出版的《中大三十年》，眼睛却盯着一位穿着黑色T恤的男同学递过来的一只吹涨了气的透明避孕套，一脸尴尬。高校长身后不远处，是面带笑容的高太太黄美芸女士。高校长当时并没有接过避孕套，不过如果他接过并打开的话，他将发现里面装着一张卷起的小纸，上面画着一位象征标准中大学生的卡通，旁边还写满各种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的字句。以我理解，这些同学希望借着他们的行动，刺激大家对大学教育有更深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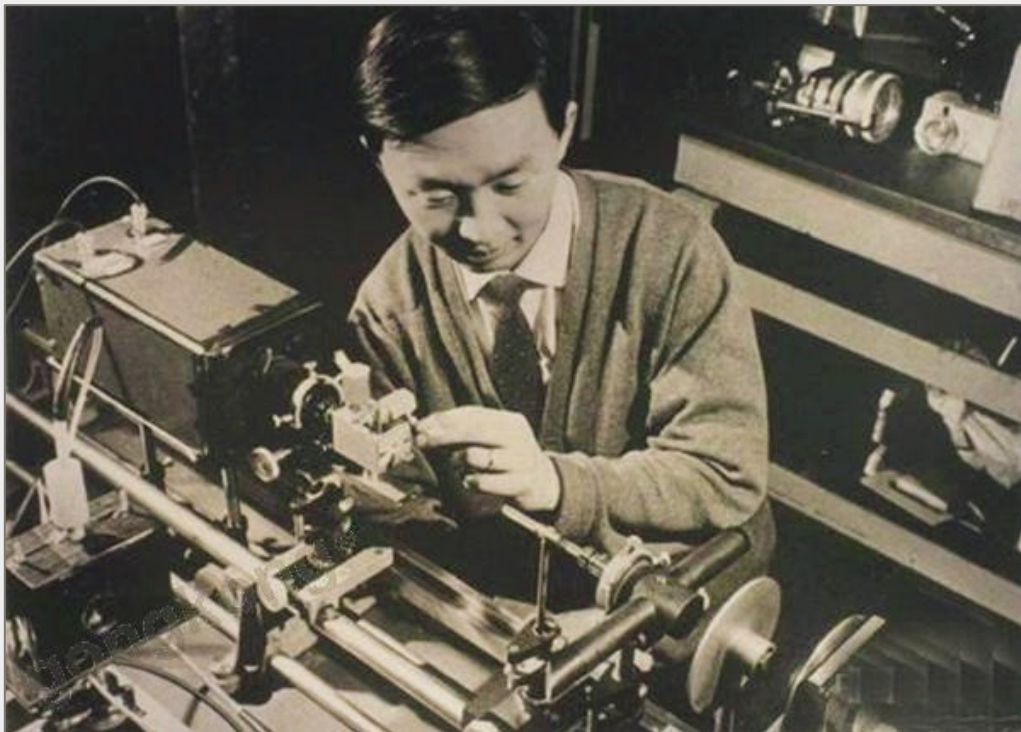
相片摄于1993年11月13日下午四时多，地点是百万大道，场景是中大建校三十周年开放日。高校长当天早上刚经历完开幕致辞遭学生冲上台抢咪，下午便又若无其事地回到百万大道参观学生团体的摊位，结果再次受到同一批学生的抗议。相片所见，高校长身边没有任何保安，百万大道阳光灿烂，人群熙来攘往，气氛平和。

为什么我那么清楚？因为我当时就在相片旁边，并将学生报刚刚出版的《中大三十年》递给高校长。虽然已是二十五前的旧事，因为这张相片，高校长的音容身影，仿佛又在眼前。

1

高校长走了，历史又被重提。1993年，我读大学三年级，是中大学生报校园版的记者兼编辑，因此见证了和高锟校长相关的两件大事，即三月的港事顾问事件和十一月的开放日事件。由于年代久远，今人对于事件发生的历史脉络，不甚了了也兴趣不大，因此媒体在怀念高校长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大而化之地赞美高校长具有异于常人的涵养和气量，却甚少往前多问一句：高校长当年的应对和选择，到底反映了怎样的一种大学理念。

先说明一个事实。今天大家都在颂赞高校长，但当年高校长对开放日抗议学生不作任何处分的决定，在大学管理层和校友组织，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不少教师也认为他软弱无能和治校无方，因此在他离任时对他评价甚低。



被誉为“光纤之父”的高锟教授，青年时代留影

事情倘若发生在今天，我相信高校长承受的压力一定会更大，得到的支持将更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许多关心中大的人看来，高校长这样是做错了，他的宽容其实是纵容，而自由必须要有有限度和底线。越过了底线，便不应该再忍，否则只会坏了大学声誉，同时害了学生。

这类言论并非那么难以理解。看看中大和各书院的校训，“博文约礼”也好，“诚明”也好，“止于至善”也好，都是要求大学培养学生成为有德之人。学生离德，便须教；不教而纵，便是师之过。从传统儒家教育的观点看，自由不是教育的最高目标，做个有德有礼的人才是。更何况，自私一点想，这些学生也在当年三月大力反对高校长出任港事顾问，如果校长利用这个机会惩戒一下他们，外界肯定不会非议，说不定还能提升他的管治威信。

这些道理，高校长一定听过不少。他听过了，认真考虑了，最后仍然顶着重重压力不对学生作出处分，那么他肯定是有自己一套对大学教育的想法，否则他难以向人交代。这套想法，和他最初提出的光纤理论一样，曲高而和寡，大部分人觉得不可理喻。不同的是，今天人人在使用光纤且对他心存感激，但他的教育理念却知者寥寥，尽管大家都说他是好校长。

2

既然是好，那么好在哪里？好在高校长够宽容，能有雅量容忍学生的异见怪行。也就是说，他有很好的个人涵养。我认识的高校长，确实是这样一个人。跟随了高校长十多年的私人秘书也说过，她从来未见过校长发脾气。不过，如果我们理解容忍不仅是一种个人修养，更是一种治校理念的话，将会发觉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容忍或宽容 (toleration) 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值得称道。例如对许多反对高校长的人来说，学生的行为既然是错的，那么就不该容忍。容忍不值得被容忍的，不是美德，而是软弱怕事，欠缺原则和承担。

观乎近年香港大学的各种争议，校方往往选择用相当不宽容的方式对待学生，他们辩解的理由，往往不是说宽容不重要，而是说学生的行为已经严重超出某些界线，因此必须强行制止。换言之，当我们称道容忍作为美德时，必须对被容忍的人和事有个先在的价值判断：他们至少是在可接受的道德范围之内。所以，高校长当年的决定，是否值得肯定，不能大而化之地抽离这个判断来谈。而根据当时校园内外的主流意见，学生的行为是不值得被容忍的。

其次，“容忍”作为西方思想史上一个重要政治概念，通常有两重意涵。一，容忍者对被容忍者的思想和行为，有一种负面的、甚至厌恶性的道德评价。二，容忍者完全有能力去影响和惩罚被容忍者，因此双方存在着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容忍作为一种美德，实际上是说：我虽然很不认同你的信念和行为，但却有意识地约束自己对你不作出干预。

由此可见，容忍，和不在乎 (indifference)、尊重及欣赏，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容忍者是既在乎自己也在乎对方的信念，同时既不尊重也不欣赏对方的信念，但却基于某些理由，选择了不干预对方的行动。这些理由，构成了容忍的基础。不过，既然容忍与否的主动权在有权者手上，那么容忍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往往相当脆弱和不稳定，因为它最终视乎容忍者的主观意志。

胡适先生 1959 年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容忍与自由〉，发表在他有份创办的杂志《自由中国》，呼吁当权者要有容忍异己的雅量，而“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源”。台湾当时的统治者是蒋介石，而《自由中国》在 1960 年因为反对蒋介石三度连任总统及尝试筹组反对党而遭停刊，主编雷震入狱十年。由此可见，将个人自由建立在当权者容忍的雅量上，确是极不稳固。与此同时，被容忍者由于处于弱势一方，自己的信念和行为又受到强者的负面评价，因此往往会感到屈从、耻辱及难以肯定自己的尊严。

也就是说，容忍虽然被视为美德，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我们对当权者仁慈的容忍过度肯定，有

时反而会忽略了制度本身的不公义（例如这种权力关系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又或被容忍的信念和行为本身就没有问题），又或会助长不合理的权威崇拜（例如你本来理应受到惩罚，当权者却大人有大量，故此你应该感恩戴德），又或将一所大学以至社会的自由建基在当权者的个人特许而非制度的保障上。

3

说了那么多，我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如果我们理解高锟校长对抗议学生的不处分是一种对学生的容忍，那么他就得面对我在前面所说的问题。例如他的容忍要么是道德上错的，要么是站在强者一方对学生的行为作出负面评价后的结果。如果是前者，高校长便不值得我们赞美；如果是后者，中大校园的多元开放便是高校长的个人仁慈所致，因此是不稳定的，同时那些被容忍的学生也不会因此而觉得受到真正的尊重。

如果不是容忍，我们是否有别的更好的方式来理解高校长的治校理念？

以我理解，高校长真正的想法是，这些同学有表达意见的自由，而他必须尊重这种自由，因为这是同学应有的权利，而不是他的施舍和特许。既然是权利，即使高校长内心对学生的行为有多么的不乐意不认同，他也没有十分正当的理由去惩罚学生。不过，从高校长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来看，他对这些同学敢于站出来表达对大学对社会的关心，其实是暗暗欣赏的——即使他们的手法相当出位。

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和容忍自己不喜的异见，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态度。前者预设了对方是平等独立的理性主体，有自己的自主性，因此也就完全可以有异于他人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权，那么自由的实践就不须仰赖当权者的仁慈，也不应受到当权者负面评价的影响，而是该得到制度的充分保障。当然，拥有自由的权利，并不意味人可以为所欲为，以及不需要遵守一些行使自由的基本规范。

我的说法有道理吗？很遗憾，我当时年纪轻，没有能力和高校长讨论这些问题。高校长作为一个科学家，估计也不会像我这般做这些细微的概念区分和道德考虑。但就我当年的观察和体会，高校长确实不是以一种容忍的心态对待学生。

我记得当年的学生报，每一期对大学都有不少尖锐批评，当然也包括高校长。那时的学生报像《明报》一般大小，每月一期，每期数十版，印发五千份，在校园有相当影响力。高校长当然知道我们的立场和态度，但每次我们要求采访，他都从不拒绝，而且总会诚恳认真地回答问题。我那时经常和学生报的同学说笑，只要见过高校长，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没法恨他，因为他的诚恳会很快感染你。

公关部职员也曾告诉过我，每期学生报一出来，校长就会叫校长室的人认真看一遍，然后将报导寄给相关部门跟进。经历了1993年两次大抗争后，高校长也一如以往每年写一封信给学生会和学生报，答谢我们的努力，同时从他的私人户口拿出两万元帮助学生会有经济需要的同学。这些事，高校长从来没有公开讲过。

说句老实话，我当时并不觉得高校长这些举动有什么特别。但我后来慢慢体会到，即使在和学生关系最差、受到最多批评的日子，他也从不视我们为敌，而是对我们有着基本的信任和尊重。今天的同学或许难以想象，当年港事顾问事件发生时，大字报多到贴满范克廉门口数十块流动宣传板，甚至连地下都贴着批评他的文章。而在我和他的访问中，高校长从来没有投诉和抱怨，也从没有流露过半分不被理解的委屈——而我在某次访问后的新闻标题是「港顾徒具虚名，校长一事无成」。

真个是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人到中年，我才明白这实在不容易。

4

现在让我们去到最核心的问题：既然不是容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高校长如此尊重学生的自由权利，并将这个权利看得比个人荣辱和大学声誉还要高？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来自他的科学精神。高校长是一位科学家。科学的终极精神，是追求真理。要发现真理，就必须要有充份自由的学术环境，容许师生在没有顾忌和恐惧下自由探索。在科学的世界，没有权威是不能挑战的。家长制、对主流的盲目服从、意识形态教育，和基于某些政治目的而限制人的思想，都是科学最大的敌人。要在学术上有突破和创新，就必须鼓励异见，必须对常人眼中离经叛道的观念给予最大的包容和尊重。

我认为，对高校长来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语）是科学之本，也是大学之本。他的科学精神和大学理念，一脉相承且一以贯之。正是这一点，使得高校长成为真正的教者。

这不是我的主观臆测。例如在陈惜姿的访问中，有以下对话：「要培养一个像你一样出色的科学家，要有什么条件？」「我读科学最大的优势，系待人处事都用开放的态度。」「最好的环境，就是父母没有限制我们应该做什么。」又例如高校长公开说过：「千万不要盲目相信专家，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譬如我说，光纤在一千年之后还会被应用，大家便不应该随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

我有种感觉，高校长整个生命，都是活在他的信念之中。我们因此见到，无论在什么时候，他总是那么随和谦逊和处之泰然。也正因为这样，高校长在开放日当天被学生抢咪后，面对我以记者身份的提问，才会自然而然地回应：「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最教我震撼的，其实不是高校长说了什么，而是他回答我时的神情和语气。他好像是在说，事情本来就该这样，即使他是光纤之父和中大校长，也该是这样。而我们从高太后来的回忆中知道，高校长回家后，和她说了句「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

除了科学精神，我想高校长也会同意，一个自由开放的大学环境，对培养学生的个性同样重要。什么是个性？就是每个学生都能通过生活的实验，了解自己的性格和志趣，追求和实践自己的理想，从而活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正如哲学家密尔（J. S. Mill）在《论自由》中所说，实现个性是活得幸福的重要条件。而人要有个性，社会主流就不能动辄以习俗和权威之名，扼杀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必须承认和尊重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独特性，都有权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

高校长走后，我在网上看到不少昔日同窗都在缅怀当年中大的自由环境如何培育和陶冶了他们的心灵和个性。是的，自由像风，摸不着看不到，但却实实在在滋润我们的生命。我们用我们活着的人生，印证自由的美好。

如果我还有机会和高校长聊天，我相信他一定会同意，自由是大学的命脉。没有自由，大学将什么都不是。今天香港教育的主事者，以至我们每个人，如果看不到这点并努力共同守护大学摇摇欲坠的自由，那将是对高校长最大的辜负。

5

最后，让我说个小故事。

1994年，中大大学生报刊登了一位同学的文章，投诉某位老师的课程检讨出了问题。这事引发轩然大波，甚至将我和学生报卷进官司之中。我大学生生活最后一年，为此筋疲力竭。1995年五月，高校长叫我和几位同学到大学行政楼，交代事件最新发展。临离开时，校长拉我到一边小声说，此事大学有做得不妥之处，事情现已解决，你可以放心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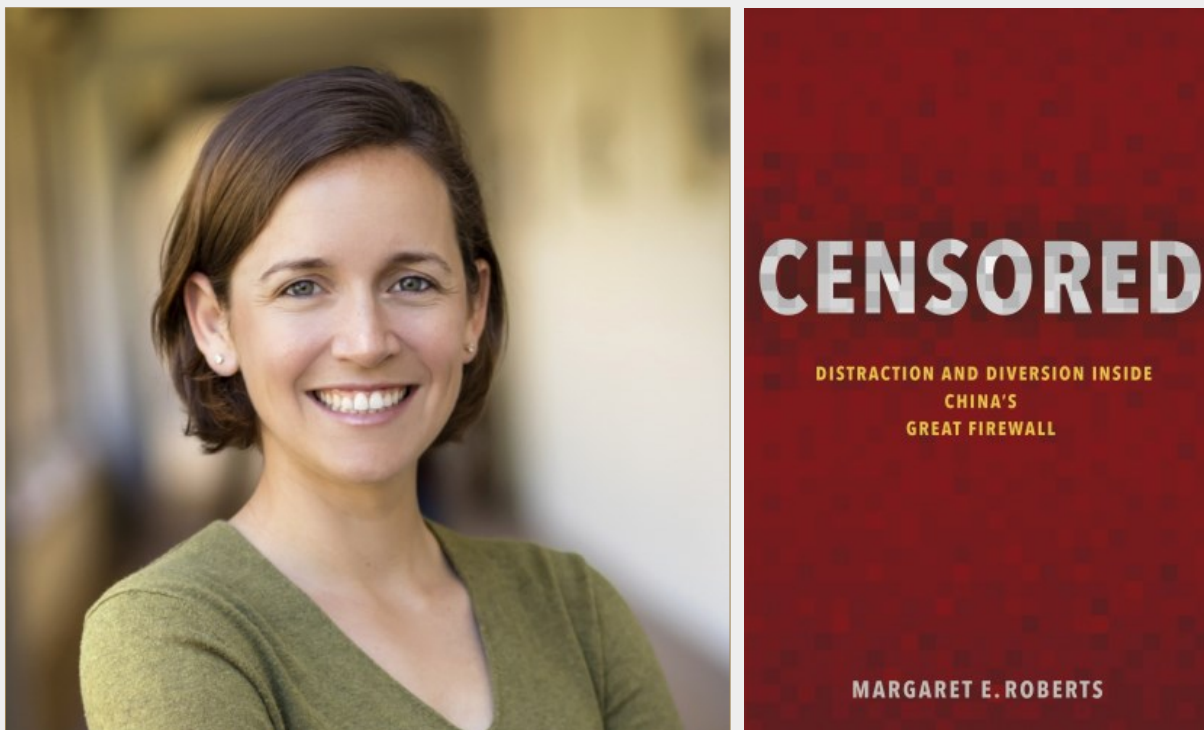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高校长对话。

校长，谢谢啊。再见。 🍷

[【返回目录】](#)

新闻实验室：中国“有孔洞的审查制度”

[本文转载自“新闻实验室会员计划” (newslab.info)]



玛格丽特·罗伯茨教授 [Margaret Roberts] 和她的新书《审查》(Censored)

最近，有一本研究中国审查制度的新书出版，书名就叫《审查》(《Censored》)。作者玛格丽特·罗伯茨 (Margaret Roberts) 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系的助理教授，大家一般叫她 Molly。她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是政治学家加里·金 (Gary King)。

加里·金是一位世界级的政治学者，也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大师级人物。在过去几年里，加里·金和他的团队陆续发表了多篇研究中国网络审查制度的文章，包括对五毛党的研究和对中国网络删帖机制的研究，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孔洞审查”

作者 Molly 也是加里·金研究团队的一员。她在对中国的审查制度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之后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将其总结为“有孔洞的审查” (porous censorship)。

这个词相当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审查机制的特点：审查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如果愿意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我们是可以避免审查的。但现实是，即使是有孔洞的审查，已经足以实现对于绝大多数人的信息控制。

审查在本质上是对人们言论表达和信息获取的限制。为了维持统治，政权天然地具有冲动去删除

那些可能危及统治的信息，阻止更多的人看到。这点任何政体都不例外。

民主制度下，政权要更多地受制于法律和舆论，因此信息控制变得十分困难；相较而言，威权政体则没有那么多限制，进行信息控制的手段也更加多样。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能够实现更强有力的信息控制，那么为什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威权政体并没有那么做，反而要留下一些孔洞和缝隙？Molly 在这里用到“独裁者困境”（dictator's dilemma）的理论来进行解释。

完全的信息控制会带来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政府使用强制的手段限制信息流动，会造成寒蝉效应，人们将不敢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政府也就无法从网络当中了解到真实的民意。当矛盾不断积累，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第二是会影响经济发展。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与世界联系得越紧密，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就越密切。无论是外国在华企业，还是中国的本土企业，在中国境内都需要与外国公司进行沟通，需要使用外国公司的服务，或是要从外网上获得信息。如果这些沟通和需求受制于信息控制，将不可避免地伤及经济。

既然威权政府难以实施完全的信息控制，那么有孔洞的审查就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选项了。那么这样的孔洞审查是如何运行的呢？在书中，Molly 详细介绍了三种审查方式，包括制造恐惧（fear）、增加阻力（friction）和信息泛滥（flooding）。

简单来说，政府用制造恐惧的方式来对付那些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让他们因为恐惧而在网络上保持沉默，或者进行自我审查；用增加阻力的方式（例如长城防火墙）增加大众获取信息的难度，从而过滤掉那些对于墙外信息没有迫切需求的人；最后再用信息泛滥的方式在墙内制造出大量与政府口径一致或者和政治无关的信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得人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意愿去关注别的信息。

中国政府通过三种审查方式的彼此配合来实现信息的精细化控制。那么，这三种审查方式具体是如何运作的？每种审查机制下政府和民众之间如何互动？这样的审查对民众是有效的吗？接下来我们一一进行介绍。

制造恐惧

第一种审查方式是制造恐惧（fear），它的最大特点是能让民众明确感受到审查的存在，并且因为担心遭到惩罚而实现自我审查。

最明显的例子是通过立法和行政的手段限制言论表达和信息流通，比如《网络安全法》或者转发谣言超过 500 次入刑的法律条文都属此类。但是这样的审查方式成本高昂，政府需要付出相当的执行成本，很难得到大规模的施行。因此，这种方法更多地被用于针对特定的公共人物，例如律师、记者和网络上的意见领袖等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的人群。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更常用的方法是网络删帖，删帖同样是一种能够让人马上意识到审查的手段。

删帖会让人们感到害怕而实现自我审查吗？作者认为恰恰相反，删帖的行为非但不会让人们害怕，反而会引起民众的愤怒和反弹。当人们意识到信息正在遭受行政力量的干涉，他们会有更强烈的意愿去接触这些信息。

关键在于如何验证？怎样确定在被删帖之后人们是反弹了还是真的进行了自我审查呢？作者在书中使用了问卷调查和实验法等多种方式进行交叉验证。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作者 Molly 和她的老师加里·金一样，都是擅长研究方法的学者，能够用巧妙的研究设计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她在书中得出的每一个结论基本都能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

在这里我们介绍其中一个有趣的实验。首先，作者采用了一个微博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中记录了 1000 多万条微博用户的账号，爬虫会对这些账号进行实时地爬取，记录下用户发出的每一条微博。如果一条微博发出之后又被删除，则认为这条微博遭到了审查。

接着，作者采用配对设计的方法，从所有爬取到的微博中找到两则完全相同的微博，但是它们是由两个不同的用户发出的。其中一条微博被删除了，另一条微博没有被删除。现在，我们要比较的是，两组（微博被删以及没有被删）不同的用户在微博上的表现有没有明显区别。

作者引入了一个“文本相似度”（string similarity）的概念，假设如果一个用户在微博被删除之后又发出了和被删微博相似的微博（高文本相似度），就认为删帖行为激起了这个用户的反弹；如果一个用户的微博遭到删除之后，不再发出和被删微博相似的微博（低文本相似度），则认为这个用户进行了自我审查。

最后的结果显示，微博被删除的用户，他们此后发出的微博的文本相似度要显著高于微博没有被删除的那组用户。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删帖行为加剧了民众的反弹。

增加阻力

如前所述，制造恐惧的方法效果有限，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容易激起反弹。与之相比，增加阻力（friction）的审查显得更加不易觉察。

增加阻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防火墙。如果说删帖是让我们发出的内容永久消失在互联网上，再也没有被看到的可能；那么防火墙则是在我们和信息之间加了一道人造墙，信息依然存在于互联网上，但是我们无法通过常规方式看到，只有翻过这道人造墙后我们才能看到它。

中国政府有能力把这堵墙加得更高更坚固吗？有翻墙经验的朋友会注意到，每逢特殊的时间点，例如两会或者党代会期间，大量的翻墙工具就会突然失效，在节点过去之后又可以继续使用。这表明，政府拥有在短时间内让大多数翻墙工具瘫痪的能力，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让它们周期性瘫痪。为什么？就如开头所说的，这样的孔洞和缝隙是必要的。

因此作者认为，防火墙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税”。首先，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意愿去看到那些被挡住的信息；其次，我们需要在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才能够享受到自由开放的互联网。

但是事实上，有足够的意愿就已经很困难了。据 2015 年一份对中国城镇居民的全国性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六成的城镇居民有使用互联网的习惯，而这些人当中有接近五成不知道防火墙为何物。

排除掉没有使用互联网和不知道防火墙的人，中国大概只有三成的城镇居民知道防火墙的存在。而这些人当中，又只有 16% 的人曾经使用过 VPN 进行翻墙，他们只占全国城镇人口的不到 5%。也就是说，20 个城镇居民里，只有 1 个曾经翻过墙。可以预计的是，农村的比例还要更低。

那么，那些知道防火墙存在的人为什么不选择翻墙呢？问卷显示，只有 2% 的人表示他们害怕遭到惩罚，9% 的人表示他们是基于法律的考量。45% 的人表示他们没有翻墙的需求，15% 的人表示不知道如何翻墙，14% 的人嫌翻墙太麻烦。

作者在这里使用“理性地忽视” (rationally ignorant) 来解释人们不愿翻墙的原因。该理论认为，人们在浏览信息的时候会考虑收益和成本支出，大多数国家的民众都只愿意花费很少的精力和成本来了解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

因为人们认为阅读这些信息对他们没有帮助，也就不愿意在上面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二是人们认为即使知道事实和真相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人们只有在危机的情况下，或者只有在政治会立即影响到自己生活的时候，才会去了解相关的信息。

那么愿意翻墙的又是些什么人呢？根据调查，翻墙群体具有高学历、年轻和高家庭收入的特点。在政治态度方面，他们对政治更感兴趣，也具有更强的政治效能感——所谓的政治效能感，指的是人们评估自己的政治参与能够对现实政治起到多大的影响。

因此作者认为，防火墙加大了原本就已经存在的数字鸿沟。它加大了人们获得信息的阻力，但是这种阻力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来说更加容易克服，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来说更难以克服。在这里，接触开放的互联网反而变成了一种信息特权。

增加阻力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让人不易察觉。人们无法打开一个网页的可能性有很多，可能是审查的原因，可能是网速的原因，也可能是网站自身的原因。由于人们习惯了高速的网络环境，当人们无法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潜意识地会选择直接退出，而不会去思考自己为什么无法看到这个页面。审查者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个习惯。

谷歌从 2010 年开始被防火墙干扰，但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被完全封锁，当局只是让网络连接变得不稳定乃至时断时续，用户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等待，但是仍然可能看到返回结果，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 2014 年。

审查者使用的策略也就显而易见了：一开始先通过持续干扰的方式降低网站的使用体验，让看到

困难的用户逐渐摒弃以往的使用习惯，转而使用墙内的替代性工具，时间长了以后，当人们的使用习惯已经转变，再彻底封锁这个网站，这样就不会引起大规模的反弹。实践证明这样的策略相当有效。

那么，如果防火墙以突袭的方式封锁了一家大众网站，中断了人们的使用习惯，会有什么后果？作者举了 Instagram 的例子。

2014 年 Instagram 因为香港占中事件突然遭到防火墙全网封锁。突如其来的封锁引起了大量用户的反弹，人们从网络上下载各类 VPN 突破防火墙，某知名 VPN 在苹果应用商店中的排名从 1229 名突然飙升到第 6 名。与之相比，经历了多年缓冲期后才被完全封锁的谷歌和维基百科，他们被封锁后 VPN 的下载量则没有明显增加。

有趣的是，在 Instagram 被封锁以后，Facebook 和 Twitter 的下载量和用户登录数量也跟着有了明显上升，这说明政府进行封锁网站的行为反而刺激了人们去接触更多他们之前很少接触的信息，这样的封锁效果适得其反。

因此，作者认为增加阻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人不易察觉。借鉴这样的分析框架，我们还可以将更多作者没有观察到的审查方式纳入其中。

例如在搜索引擎中进行关键词检索，当结果返回“根据法律法规政策，搜索结果不予显示”的时候，你可以明确意识到你检索的内容遭到了审查；但是如果搜索引擎返回了结果，只不过这些结果是经过过滤后的结果或者根本是和搜索词无关的结果时，我们就很难意识到内容正遭到审查。

同样，当我们在微博或者朋友圈里发出的内容被删掉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意识到审查的存在，这可能引发强烈反弹；但是当我们发出的内容还在那里，却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看到，或者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无法意识到审查的存在。

而现实是，审查技术在不断进步，上述的情境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应用中出现。

信息泛滥

第三种审查方式是信息泛滥 (flooding)。所谓的信息泛滥，简单来说就是政府让你有更多机会看到它想要让你看到的信息。在作者的论述中，这接近于宣传。

为什么宣传也可以算是审查方式的一种？作者认为，宣传能够让某一类信息更加容易触及民众，同时也就相对提升了民众获取其它信息的成本，因此它造成的结果和审查是一样的。

打个比方，如果政府现在想要推广新能源汽车，那么一般会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给传统汽车（政府不想让你看到的信息）加税，也就是提升你购买传统汽车的成本；另一种方法是给新能源汽车（政府想要你看到的信息）补贴，也就是降低你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成本。两种手段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在这里，信息泛滥就相当于一种补贴，它和增加阻力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传统观点认为，信息越多元，信息竞争就越充分，政府也就越难以达到信息垄断。但作者认为事

实并非如此，低价值信息和垃圾信息会挤压和占用人们的宝贵时间，让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阅读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这也再次印证了：信息过载就是一种审查 (information overload is censorship)。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

那么，中国政府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信息泛滥？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两点。

第一种方法直接面对媒体和平台，通过下达宣传指令的方式控制它们的报道内容，进行议程设置。例如什么样的内容要突出报道，什么样的内容不能报道，什么样的内容又要以新华社的报道为准。当媒体合作报道同一事件的时候，人们就会认为这件事是重要的，从而忽视掉那些替代性的报道，也就被转移了注意力。

第二种方法是直接面对民众，通过水军来引导舆论。在一篇针对五毛党的研究中，作者发现，五毛党在网络上很少会为政府的行为和决策进行辩护，也不会嘲讽外国政府，更不会和那些批评政府的言论进行辩论，而是经常发一些歌颂“正能量”和“中国梦”的内容。

这些内容看似无关紧要，很少有人会被标语式的宣传说服，但是只要你看到了，你的时间就被占用了。在公共讨论中，这样的内容无疑也会使得严肃的讨论无法进行。因而，从根本上来说，网军并不是在试图说服你，而是为了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有更少的机会接触到那些政府不想要你看到的信息。

以上就是《审查》一书的主要内容。技术的进步让信息控制变得更加精细，也更加难以察觉。开放互联网本是自由获取和分享知识的平台，如今却成为一种加剧数字鸿沟的信息特权。 ■■

[【返回目录】](#)

茅于軾教授九十岁寿辰学术庆祝活动众筹

一、背景与意义

茅于軾教授生于 1929 年 1 月 14 日。原为铁路工程师，后自学经济学，1985 年发表《择优分配原理》。1993 年与几位经济学家和大象文化公司共同创立天则经济研究所。其后又创立了富平保姆学校和人文经济学会。他的道德文章，君子人格，为一代师表。

2019 年 1 月 14 日，将是茅于軾教授 90 岁寿辰。借此机会举办一次庆祝活动，一来表达我们的敬意，二来学习他的理论思想。具体形式就是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以他的学术著作及其它论著为主，研讨茅于軾教授的学术和思想贡献。

二、具体形式

1. 2019 年 1 月 14 日，举办“茅于軾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暨庆祝他九十岁寿辰活动”；时间一天，参加学者 20 名，参会人数 100 左右人；
2. 编辑印刷《茅于軾教授九十寿辰庆祝画册》。

三、拟邀请嘉宾

茅于軾教授在经济学界，法学界，其它学术界，企业界的朋友；天则所的同事，曾经在天则所工作过的人士；等等。

四、筹款目标

30 万元人民币

五、截止日期

2018 年 12 月 14 日

六、众筹形式

众筹回报包括：

1. 600 元

参加“茅于軾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暨庆祝他九十岁寿辰活动”；
获得《茅于軾教授九十寿辰庆祝画册》一本；

2. 1800 元

在获得前面所有回报基础上

获得 [茅于軾《择优分配原理》发表 30 周年] 学术研讨会纪念品;

3. 5000 元

在获得前面所有回报基础上

获得 《茅于軾思想集萃珍藏版》光盘 1 套;

4. 30000 元

在获得前面所有回报基础上

获得与茅于軾教授一起合影并喝茶的机会

5. 100000 元

在获得前面所有回报基础上

获得茅于軾教授的墨宝一幅。

五、捐款方式

(1) **银行账户：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账号：861581962310001

(2) **支付宝账号：xueruijie@unirule.org.cn**

(3) 汇款请留下联系方式，并注明“茅老 90”。

(4) **联系人：**

李 冰：13601286718, libing@unirule.org

胡明东：15011147717, humingdong@unirule.org 

[【返回目录】](#)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年3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年3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干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年4月，「**铁路改制：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年9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年10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2015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二. 众筹方案

2018-2019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1. 众筹目标：3万元（2018-2019年度4-5场沙龙的总经费）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3. 众筹回报: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 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 (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 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 (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 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 (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 (每期沙龙仅一位): 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 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 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 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 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 (全年仅一位): 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 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 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 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 861581962310001 (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 wistom113@163.com, 13717696284。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 2018-2019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 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微博: 云豹 ONE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nGlllI-5ehNtyrler9dKw> 密码: t9ed